

梁启超传

LANGQICHAO ZHUANG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梁 启 超

王立平 编著

目 录

一、少年时代.....	(1)
(一) 家世	(1)
(二) 少年得志	(4)
二、投师康门.....	(9)
(一) 康圣人	(9)
(二) 思想活跃的万木草堂.....	(11)
(三) 思想的飞跃.....	(13)
三、初涉政坛	(16)
(一) 公车上书.....	(16)
(二) 为维新运动奔走呼告.....	(18)
四、戊戌变法	(24)
(一) 策划变法.....	(24)
(二) 百日维新.....	(27)
五、亡命生涯的奋斗	(33)
(一) 被迫逃出国门.....	(33)
(二) 策动“庚子之役”	(36)
(三) 办学和办报.....	(39)
(四) 和孙中山的交往.....	(43)
六、立宪派的主帅	(48)

(一) 与革命派的论战·····	(48)
(二) 立宪运动·····	(50)
(三) 组织政闻社·····	(52)
(四) 宪政、财政和外交思想·····	(54)
七、和袁世凯的合作 ·····	(59)
(一) 政变计划破产·····	(59)
(二) “虚君共和”方案的失败 ·····	(63)
(三) 制定“联袁”方案·····	(66)
(四) 进步党领袖·····	(69)
(五) 第一流人才内阁的下场·····	(73)
(六) 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 ·····	(77)
八、护国战争 ·····	(79)
(一) 帝制逆流·····	(79)
(二) 与袁世凯决裂·····	(81)
(三) 策划西南发难·····	(84)
(四) 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成立·····	(87)
(五) 护国战争的胜利·····	(90)
九、在野政治家生涯 ·····	(94)
(一) 研究系的形成及活动·····	(94)
(二) 复辟丑剧·····	(97)
(三) 出任段阁财长 ·····	(100)
十、逆革命之潮流·····	(103)
(一) 欧洲之行 ·····	(103)
(二) 撰写《欧洲心影录》 ·····	(106)
(三) 坚持改良主义立场 ·····	(107)

(四) 支持联省自治和幻想组织第三党	(109)
十一、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	(111)
(一) 办学与讲学	(111)
(二) 推进文化交流	(112)
(三) 著述成果	(113)
十二、逝世	(115)

一、少年时代

（一）家世

美丽的珠江三角洲，河渠网布，碧波长流。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勤劳勇敢的人民。梁启超的家乡就坐落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南国水乡——广东省新会县的茶坑村。

新会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距花城广州 100 多公里。由新会渡江向东，不到 100 华里，是香山县。县里有一个风光旖旎的翠亨村，是比梁启超大 7 岁的伟大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诞生的地方。由新会渡江向北约 100 华里，是南海县，那里的银坑乡苏村，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后来成为梁启超师傅的康有为的故乡。梁比康小 15 岁，梁出生时，康已是饱读诗书的少年了。如果由南海县越广州渡珠江向北约 50 华里，就到了广东花县，这里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杰出领袖洪秀全的故乡。梁启超降生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已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洪秀全已壮烈殉难九周年了。离茶坑村仅几十华里

的香山县南屏村，是留学美国的贫家子弟容宏的故乡，他在梁启超出生的前一年率詹天佑等幼童往美国留学。

美丽的土地，伟大的人民，哺育出优秀的人物。19 世纪初叶，在这块最早遭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土地上，诞生了许多去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梁启超降生的时候，清廷受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强大的武力和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轴的经济实力的威胁，被迫放弃与世隔绝、万世长存的美梦，打开门户，举办洋务。“师夷之长技”，妄图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力量和科学技术来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并没有使清廷真正强大起来，却客观上引进了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资本主义的新的生产力给中华大地带来了希望。

古老的中华大地这种血与火包围下的新陈代谢，唤醒了一批有头脑的先进知识份子去重新认识世界，反思中国，面向未来。梁启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开始他的生活和斗争的航程。

梁启超出生于 1873 年（清同治十二年）。梁氏家族世代居住在新会县南部一个紧靠陆地的小岛熊子乡，是靠剥削起家的小地主，到其祖父梁维清这代，梁姓在茶坑村居 2/3，有较大的势力。

茶坑村是一个拥有 100 多户人家，5000 余人的村庄，依山傍水，村民多以耕种捕鱼为业。民风朴实，乡民具有顽强的生活能力，善于应付各种突然事变，勤劳俭朴，务新、求实、自治，崇尚封建伦理，向往升官发财。当时的茶坑村实行一种带有自治色彩的乡绅保甲制度，其最高权力机关是耆

老会，并设有自己的地方武装——乡团。耆老会管理村里的经济、治安，处理民事纠纷，组织公益事业。梁启超的祖父和父亲都先后做过耆老会的主持。

梁氏家族虽然已经开始富起来，但在整个地主阶级中，还属于“富而不贵”的小地主之流。他们家族中，还没有人通过科举的阶梯跻身于上层封建统治者之列。对此，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深以为憾。他决心改变这种局面，自己苦读诗书，以期实现梦寐以求的为官梦。其夫人黎氏，系广东提督黎第光之女，对改变梁氏门庭也很卖力。然而不尽人意的是奋斗多年的梁维清也只中了个秀才，挂名府学生员，在仕途上也不过做到教谕，即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小官。在清代九品之制的官阶中，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八品官。梁维清发奋读书的成绩虽然不过如此，但在茶坑村那样的小乡村，梁维清却已经算一个大人物了。他自鸣得意，总算给梁氏家族开辟了通往官场的道路。凭借教谕的头衔和身份，梁维清购买图书，采买了十几亩好地，并满怀信心地让儿子梁宝瑛在他已经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奋斗。梁宝瑛是梁维清的第三个儿子，即梁启超的父亲。梁维清对宝瑛要求极严，千方百计地让他刻苦攻读，希望他能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梁启超的这位父亲大人不但未能在其父达到的高度上更上层楼，而且苦读一生，连续应试，从少年童子到两鬓染霜，竟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最后只落到一个教书先生，出入茶坑村的私塾之中。

但梁宝瑛一生勤奋，事事处处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严格要求自己，以地主文人的标准评论是非得失，严守其父开创的

家风，为后代能跻身官场费尽心血。梁宝瑛的为人使他在茶坑村有一定威信，曾经掌握耆老会长达 30 多年，为乡邻做过一些益事，为乡亲所拥戴。

梁启超的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粗知诗文，勤劳干练，贤淑聪慧，以“贤孝”闻名乡里，属于典型的中国封建文化陶冶下的贤妻良母。母亲的敦厚朴实、温柔忍让的品德对梁启超的一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二）少年得志

梁启超的幼年是在“神童”的一片赞誉声中度过的。梁启超出世的时候，他的祖父正在做教谕，父亲正奔劳于科举的道路，加之母亲粗知诗书，梁氏家族对这位将来顶立门户的梁门长子，自然寄予满腔热情。

梁启超才华早露，童年时就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深受梁氏家族的宠爱。其父梁宝瑛一向视之为奇才。祖父梁维清更把他看做梁家出人头地的希望，对他是宠爱有加。母亲赵氏将全部的爱深深倾注在幼年的启超身上，对他进行千方百计的诱导。母亲谆谆的教诲和无私的关怀无时无刻不在激励鞭策着童年的启超发奋读书。

由于较优裕的家庭经济条件，使梁启超能够较早地开始启蒙教育。10 岁以前，梁启超并未外出就学，其启蒙教育主要是由父母和祖父来完成。两岁时母亲就教他识字，四五岁时就在祖父的教导下读四书五经。到了晚上，祖父一面给他讲故事，一面让他背书。祖父还教他书法。慈祥而又严厉

的祖父，给幼年后超的心田里播下了求知的种子。祖父给他讲的激动人心的英雄故事，孕育了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6岁未滿，幼小的后超已经读完五经。之后，他到父亲的私塾学习《中国略史》等课程，开始接受比较系统的中国历史的知识。8岁即学作八股文。在祖父、父母的悉心教导下，梁启超学业大进，9岁便写出了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八股文章。“神童”之称渐在茶坑村一带传开，使他祖父和父母都异常高兴，以为他们数代未竟的理想，就要由这位梁门长子来实现了。有亲友到梁家来作客，见到后超没有不夸他聪明的，有的还出题相试。有一次，一位客人欲试试他如何的聪明，就出了一句“饮茶龙上水”，命他对。后超稍作思考，脱口答道：“写字狗扒田。”上联是新会俗语，下联对的也是新会俗语，极是工整得体，客人赞不绝口。

梁启超地主阶级的出身，决定了他要走封建时代年轻人所理想的道路，那就是读书——考科举——升官——发财，并且他较一般人要早。

1882年，梁启超刚满9岁，他的祖父和父亲就决定让他到广州去考秀才。梁启超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由新会坐船沿西江而上，同船的乘客大部分都是赴省应试的读书人，其中有十多岁的少年，也有四五十岁的老书生，面对这些兄长、叔伯，年龄最小的后超不免有几分怯意。舟行途中，满船的童生们故作高雅，赋诗连句。一天中午，大伙儿舟中共餐，有人忽然提议以餐中咸鱼为题吟诗作句。当满船学子还在苦思冥想之际，梁启超卓尔不群地当众咏出了“太公垂钓鱼，胶鬲举盐初”之句。这十个字，风格高雅，诗意浓厚，博得众

人一片喝彩。满船的人都惊叹于年纪最小的后超不寻常才华。自此，舟中咏诗的故事，不胫而走，梁家“神童”的声名传遍了新会。

这次应试，梁启超虽然没有考中，但他从偏远乡村走向了繁华的广州大都市，见了世面，增长了知识，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回乡后，他更加发奋攻读，并反复参阅从广州买来的一些新书，其中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对他影响极大，使他眼界开阔了不少。

1884年冬，11岁的梁启超第二次到广州应试，中了秀才，补博士弟子员。11岁的童子中秀才，这在中国科举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广东省主考学政使叶大焯特地接见了梁启超等几位年纪较小的秀才，并“试以文艺”，梁启超的对答条理清楚，极少差错，令叶大焯惊叹不已。而叶也对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士表示了特别的垂青。机灵的梁启超乘机向叶大焯为其祖父梁维清的七十大寿请寿言，梁长跪向叶表示自己的请求。叶大焯感于启超的伶俐和孝顺，满口应允，破例挥毫写下一段长长的祝寿文。清代的一省学政为三品大官，在乡村野里，简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当梁启超将那张祝寿文悬挂于家中时，梁家的客厅四壁生辉，喜气冲天。整个梁氏宗族也感到莫大的荣耀。乳臭未干的梁启超面对络绎不绝前来道贺的乡邻亲朋，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快乐。通向荣华富贵的仕途之门似乎正在向他徐徐敞开。

根据当时的制度，考中秀才，也叫“入学”，即取得了进入官立学校继续读书深造的资格。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进入当时广州著名的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当时广东的

最高学府，是由前两广总督、颇有文名的阮元设立的。和学海堂并立的还有诤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号称广东 5 大书院。各书院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但皆以汉学为主要教学内容。1888 年，梁启超取得了学海堂正班生的资格，同时又成为诤坡、粤秀、粤华等书院的院外生。当时这些高等学院，流行乾嘉以来以考据为中心的汉学，讲授词章训诂、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学问，进行着考据、辨伪、辑佚、补正的训练，同时也注重文字学的基本训练，对于成为当时士子们进身之阶的八股文却反而不太重视。这些学问虽然较为枯燥，但是一种较实用的真本领。梁启超从学的先生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等都颇有汉学根基，对梁启超影响较大。近五年的学习生活使梁启超有机会接触各种学术流派和广泛地涉猎古经典籍，打下了较坚实的汉学基础。梁启超学习极其勤奋，兴趣广泛，对知识如饥似渴，是学海堂出类拔萃的高材生。曾经得到“四秀大考皆第一”的好成绩。

1889 年，饱读经、史、子、集，颇具训诂词章之学的梁启超，结束了四年多的学海堂学习生活。这年 9 月，梁启超踌躇满志地参加了广东的乡试，结果是一举中的，榜列第八名举人。主持这次乡试的正主考是贵州的李端谔，副主考是福建的王仁堪。两位主考大人一齐被梁启超的才华所吸引。王仁堪暗想要将女儿嫁给梁，而李端谔则决定将自己待嫁的妹妹许配给这位才貌俱佳的少年举人。由于李先开口，王仁堪只好收藏起心底的秘密，连声道贺。出身于海隅之地小地主家庭的梁启超，怎么也不会想到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如此轻而易举地自天外飞来，而且飞来的又是这样一位名门望族

的大家闺秀，当然是惊喜交加。

李端谝的妹妹李惠仙，知书达礼，举止端庄。1891 年秋天，梁启超在其父的陪同下前往北京与名门小姐李惠仙正式完婚。少年及第，佳人相伴的梁启超陶醉在无限快乐之中，他哪里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条他当时还想象不到的新的道路。

二、投师康门

（一）康圣人

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逐步衰落的大地主官僚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也是希望走封建士子们的科举老路。17岁那年，读了一些介绍西方国家的书籍，眼界大开，对变幻中的西方世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文明。1876年，康有为拜当时颇有名望的今文经学家朱次琦为师，在朱讲学的南海九江镇礼山草堂学习三年，学业大有长进，思想也发生较大变化。

康有为研究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治世，三年的求学生涯结束后，他发现自己仍然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彷徨、苦闷时时困扰着这位忧国忧民的青年士子。

1879年底，康有为怀着一种好奇心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已被英国的资本主义文明统治了30多年，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结构所带来的物质繁荣，尤其是崭新的思想文化令康有为惊叹不已。在香港，康有为购买了一批

图书和地图，他要开始新的研究和思考。

这次香港之行，对康有为的思想触动很大。从香港返回南海后，康有为就开始十分注意中学和西学的比较，善于从中西文化的结合上去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窒息中国文化学术生机的汉学便也走到了末路。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大力提倡今文经学，疾呼研究现实问题，假借经书的片言只字，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利用今文经学中的“微言大义”揭露当时的社会矛盾，抨击统治阶级的罪恶，提出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和挽救社会危机的改良主义措施。

康有为师从朱次琦学习今文经学之后，他曾经几次应广东和顺天乡试，都没有考取。数次北京、上海之行，他不仅目睹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所引起的社会危机和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所引起的民族危亡，而且他也亲眼见到过香港、上海等资本主义的都市文明，这一切都使他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封建制度要优越。康有为改造社会的要求更加迫切，他将数年中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同今文经学的社会哲理以及佛学、陆王心学杂糅到一起，再结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思想文化水平，逐步形成了一套变化维新的理论和改良主义的改革方案。康有为把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都寄托在他的这一套改良理论和方案之中了。

1888年5月，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顺天乡试时，他决心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在北京，康有为草拟了《上皇

帝书》（即上清帝第一书），从国际、国内的形势分析，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主张。这一上书因受顽固派礼部尚书许应骙和礼部侍郎李文田等的阻挠，并没有到达光绪皇帝手中。万幸的是，这帮腐朽官吏虽然将上书扣压下来，但是为了避免给自己惹祸，他们也没有追究胆敢对朝廷指手画脚的康有为的责任。

康有为的上书虽然失败了，但他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不顾杀身之祸参政议政的胆识和勇气鼓舞了政治界和知识界。不少文人、学者、名士、官吏在偷偷传抄他的上书，康有为的名声也渐渐地传开了。

（二）思想活跃的万木草堂

1899 年秋，康有为怀着沉重苦闷的心情，踏上了返回广东的征途。

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深感民智未开、人才匮乏，于是他决心从培养人才入手。从 1890 年开始，康有为即在故乡开馆授课，借机宣传自己的一整套学术和政治理论。

梁启超初识康有为是在 1890 年。这年春天，梁启超北京会试落榜后，继续回到学海堂求学。8 月的一天，梁启超的同学、康有为的学生陈千秋，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陈千秋转述康有为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极大地震撼了这位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学子。梁启超拜会康有为后，为其学识、思想所折服，毅然决定退出学海堂，从师于康有为。经过康有为整整四个春秋的教诲，为梁启超的一生谱写

了颇富激情的一章。

最初，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邱氏书屋，1893年，随着投奔的青年学子日渐增多，长兴学舍人满为患，再迁于府学官仰高祠（今广州工人文化宫），匾书“万木草堂”。万木草堂环境幽雅，是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康有为一反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对教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改革。康有为的讲授，把求知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学生既读书做学问，又积极地关注国家命运，从古今中外的思想宝库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康有为凭借万木草堂的讲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大胆地纵论天下大事，从西方文明到列强的欺压，从先秦典章到汉唐两宋政治，无所不讲。每讲到激动时，拍案叫绝，甚至痛哭流涕。为培养学生的政治敏感和理论思维，万木草堂特别强调自学和独立思考。没有正式的考试制度，主要通过学习笔记和学习心得观察学生功课的好坏、造诣的深浅。笔记和心得每半月呈交一次，康有为认真审阅，详加指点。在草堂里还有一本《蓄德录》，是每个学生抄录的名言、佳句等，每天顺着宿舍房间依次传递，周而复始。内容随各人意志所好，写什么都可以。康有为从中观察每个学生的思想动向，以便不断改进教学的方法。

康有为讲课前，先开列书目，让学生预习，写出心得，再组织讨论，相互辩驳，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康有为讲课，既讲自己的观点，又评论各学生的见解，针对性很强，对学生的启发也大。

康有为的善于理性思维在万木草堂的教学方针中得到具

体的体现。他在中国首次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在教学的实践中加以贯彻，使万木草堂中那些从旧教育氛围中游离出来的青年大大地开了眼界。万木草堂也成为当时中西并重的新式学堂。

康有为还特别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为让学生在实践研究中增长才干，康有为还让梁启超等人参加自己的研究项目，或收集资料，或写某些章节，或编索引和提要。万木草堂的日常管理，也都是由学生来实行的。梁启超曾做过全面负责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的总学长。万木草堂的设备也较完善，学生的饮食起居和学习用具皆有妥善的安排，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阅览室。为了寓教于乐，万木草堂还设了一个礼乐器库，藏有各种仪器和乐器，康有为曾亲自谱曲编舞。康有为还经常让学生结队出游，让学生在大自然中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

万木草堂的教学，改变了封建社会的“死读书”境况，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求实、善思、创新、奋进的良好学习风气，使学生得到全面的锻炼，充分发展青年人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激发了青年学子们跳跃的思想火花。当时的万木草堂，新思想、新观点层出不穷。

（三）思想的飞跃

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求学时恰值 17 到 20 岁，正是思想活跃、勇于进取，最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龄。再加上他遇到了

康有为这样一位思想激进、知识渊博而且又善于对学生进行启发和引导的好老师，本来就思想活跃天分颇高的梁启超，学问和见识与日俱增。

康有为的授课大体以今文经学为纲，以西学为纬，掺杂佛学等思想资料，抨击现实，鼓吹社会改良。康有为最先让学生读的书是《公羊传》和《春秋繁露》。除读古书外，他还让学生读一些西洋书，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电化的著作，西方史地律例及中国人写的游记、参观欧美的日记和一些介绍西方的杂志，这些使梁启超开始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万木草堂，梁启超如饥似渴地学习，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方法。他读书十分刻苦，听康有为讲课，总是全神贯注，勤思考，很少走思，可以一直坚持好几个小时。他还养成了记笔记的好习惯，通过写读书笔记来巩固知识，融会贯通，发挥自己的见解。同时，梁启超在学习上还很注重书本知识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有意识地用实践来检验书本知识，用读书来指导实践。在万木草堂求学期间，梁启超曾经一度往佛山教书，借机大量传播康有为的政治学术观点。1893年，梁启超还往东莞县讲学，所论皆康先生之“古怪之说”，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一批青年。勤奋刻苦的学习和善于学以致用，梁启超，学问和能力迅速地增长起来，成为万木草堂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受到康有为的赏识。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受命做校勘工作；编《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分担部分写作任务。这些工作，更好地提高了梁启超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增长了才干。

梁启超也和康有为一样，其求学是抱有一种强烈的社会

责任心和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感，他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去研究学问的。面对中华大地的客观现实，康先生慷慨激昂地宣讲自己的改革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深受感染。康有为那种无法克制的爱国热情和冲动，大大地启发了梁启超，使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他开始了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创造性的理性思考。

从 1890 年至 1894 年，梁启超都在康有为门下从师学习。这四年求学康门显然是梁启超生活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四年来，梁启超逐步接受了康有为社会改良的思想体系。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思想格局大致由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循环进化的历史观点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交织起来，其核心是为改革社会寻根探源。

康有为的思想为梁启超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今文经学使他获得了改革的武器，而康有为那种掺杂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基督教神学的博爱、佛学的众生平等的大同理想，像魔幻般地吸引着青年的梁启超，并且使他用这种美好的幻觉去指导自己的行动。

梁启超通过在万木草堂的学习，使他逐步了解了世界大势，他看到了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看到腐朽的封建剥削制度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他开始忧虑起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迫切地盼望中华大地来一场大的社会改革。

四年的康门学习，使梁启超学到了远远超过八股老调和词章训诂的经世致用之学，思想发生急骤的飞跃，使他从一个普通的封建士子变成一个探索祖国命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一个激情满怀的爱国者和改革志士。

三、初涉政坛

（一）公车上书

1894年3月，为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梁启超风尘仆仆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古都北京，下榻粉坊琉璃街新会会馆。这时的北京，乍暖还寒，却已焕发出一派春的生机。然而北京城内腐败的政治，危机四伏的国难，却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凄凉。无情的政治斗争很快就把初涉政坛的维新志士卷入了斗争的波澜之中。康有为的讲学和著述，他的一整套变法维新理论的传播，虽然在不少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和广泛的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了顽固派的仇视。1894年8月，给事中余晋珊上书朝廷，诬称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请求缉拿康有为，焚毁《新学伪经考》。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立即诏令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梁启超闻讯后，万分着急，立即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他找到沈曾植、曹广钧等官吏，上下运动，为康有为开脱，最后通过当时的名流张謇，找到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得到疏通才幸免于难。但广东李瀚章还是要康有为自己焚毁著作，严禁《新学伪经考》流传。这次

小小的政治风波，是清廷顽固派与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之间巨大冲突的前兆，激情满怀而又想有所作为的梁启超感到变法的艰难，前进道路上等待他的是无情的政治斗争的漩涡。

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9月初平壤一战，清军失去朝鲜。日军越过鸭绿江，入侵辽东；10月里，黄海大战清军又遭失利。北京城里舆论大哗。在这亡国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派，却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忙着为慈禧的六十大寿庆祝。梁启超目睹清廷政治的黑暗，亡国的危险，心急如焚，而他除了吟诗以外，无法实现自己忧国忧民的报国理想。

11月，梁启超怀着悲愤的心情返回广东。

1895年3月，梁启超、康有为等到北京会试。这次会试，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梁启超却名落孙山。据传当时主持会试的主考徐桐，副主考李广田、启秀、唐景崇都是极端顽固守旧分子，最痛恨维新之论。凡是像康的卷子一律弃之，梁启超的考卷充分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充满了“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考官们毅然断定这是康有为的试卷，决定不予录取，而康真正的卷子却顺利通过。当时阅卷的李广田对梁启超文章的气势和文采十分赏识，于是在试卷末页批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这次考试的落榜，梁启超并没有感到十分不快。这时的梁启超已把科场的胜负看得淡如浮云。他把满腔的热情关注到祖国的前途和维新变法的事业上去。

1895年春天，中日战争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4月中旬，李鸿章签订中华民族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

京，当时参加会试的举人们立即沸腾了，决心抗争。康有为即刻要梁启超串联鼓动各省举人上书。梁启超四处活动。4月22日，以康、梁为首的广东、湖南两省举人首先联名上书，要求拒签对日和约，同时还鼓动朝官出面。5月1日，康、梁邀集18省120多名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康有为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大家一致通过了康有为上书朝廷的建议，并公推他为奏议起草人。康有为奋笔疾书，向清政府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三项建议。这就是震动朝野上下、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这次运动，声势浩大，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集体上书，抗议政府的新格局，第一次显示了维新派在舆论上的力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公车上书”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它唤醒了中国数千年未醒的大梦，是一代青年人爱国、求变革，奋发向上的思想的反映。上书的各省举人回乡后，对各地民智的启迪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为维新运动奔走呼告

康、梁经过公车上书，都认识到要发动维新变法，必须要有一个组织，即他们的“合群”。要建立组织，必须从制造舆论开始。1895年8月，正式创立宣传维新变法的刊物《万国公报》，附《京报》发行，每天送千余份给各王公大臣，不收报费。这一做法是梁启超的“欲开民智，先开官智”的维新思想的具体体现。《万国公报》除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政治、经济、文化、史地、风情和转录一些消息外，主要宣传富国强兵之道，极力鼓吹维新变法，以期获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报纸出刊发行后，收到了很好的舆论宣传效果。11月，经过康、梁的多处活动，筹集经费，于北京宣武门外的后孙公园正式组织起“强学会”。会员除康、梁等维新派外，还有陈炽、文廷式等以光绪帝为靠山的帝党官员以及袁世凯和徐世昌等投机分子，共20多人。从成员上看，强学会是极复杂而松散的。

强学会的章程集中地反映了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其活动主要有四项：一是定期集会，宣传变法，振兴朝廷；二是购置图书，设图书室。梁启超十分注重开风气和启迪民智。他认为开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强大的国家。他购买一批介绍西方的书籍，供王公大臣们阅读，以广见识，去成见，达到“先开官智”的目的。三是译书；四是办报。1895年12月，康梁将《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出版，内容比原来更加丰富、系统完善。综合看来，强学会是集合一批志士仁人，协助清廷改革变法，活动也主要集中于精神文化方面，绝没有丝毫危害清王朝统治的意图。但是仍为封建顽固派所不容，强学会受到弹劾。康有为被迫离京避难，北京的强学会由梁启超主持。康有为到上海后，和梁鼎芬一起组织上海强学会，江浙一带的维新名士纷纷加入。维新运动出现一派生机。

但是顽固派是绝对不能允许对其不利的团体存在的，也不能忍受维新派鼓吹与他们的专制相对立的理论。1896年1

月，清政府下令解散两地强学会，许多会员闻讯后仓皇失措。就这样，康、梁辛辛苦苦建立的维新团体和刊物转瞬间就荡然无存。

强学会解散后，梁启超深感变法维新的艰难，他认为主要是风气未开，于是他决定把注意力转向办报上。

1896年3月，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到上海办报。与黄遵宪、汪康年等利用强学会余款作资金，创办《时务报》。8月正式创刊，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在他们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维新志士或同情维新派的名流学士作为撰稿人。《时务报》宗旨是开民智，求自强，尤其注重中外时事的介绍。《时务报》内容新颖，反映民众呼声，敢于抨击时政，一时成为风靡全国的报刊。梁启超利用这一报纸作为维新派的喉舌，较全面地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改革措施，一时间梁启超名声噪起。

此时的梁启超刚二十三、四岁，精力旺盛，才华横溢，再加上他敢说敢写，符合当时人们的心声，在许多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中引起深刻的共鸣、巨大的反响。梁启超的文章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见解和优美精彩的文字，自然能吸引广大的读者。梁启超日夜辛劳地为办好《时务报》而工作，亲自撰文、编排、校对。随着《时务报》的广泛发行，梁启超也名声大噪，“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陋，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据传1897年初，梁启超往武昌拜谒张之洞，当时的张之洞为坐镇一方、手握重权之封疆大吏，在整个清廷官僚中也是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大人物。但一听梁启超求见，极为高兴，破例开武昌城中门来迎接，还问属下能否鸣礼炮。当

属下告之梁为一小小举人，按理只有迎接钦差和督抚时才可开中门并鸣炮。张之洞只得作罢，以厚礼迎梁入城。梁启超拜见张之洞那天，恰逢张的侄儿娶媳妇，宾客盈门。但张之洞丢下宾客，与梁启超彻夜长谈，张诚心邀梁出任两湖时务院长，月薪一千二百金，为梁婉言推却。

梁启超为张之洞礼贤下士的行为而感激不已，对张之洞寄予希望。他哪里知道，张之洞欣赏的只是他个人的才华，而对他在《时务报》中的非分之论早就不满，对康、梁的维新主张也是反对的成分居多。张曾授意任过其幕僚的汪康年干预梁启超在《时务报》的言论，《时务报》内部开始出现裂痕。1897年夏，汪梁之争日趋恶化，梁启超感到无法再呆下去，恰好黄遵宪调任湖南按察使，湖南的维新运动蓬勃发展，谭嗣同等人正筹办时务学堂，黄遵宪等即致信梁启超邀请他出任中文总教习。11月，梁启超由沪赴湘。

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各省巡抚中算是最开明的，具有一定的维新倾向，较为支持维新派。他敢于启用一些变法维新的士子，充分地相信和任用他们去举办新政。陈宝箴办时务学堂，是图开通湖南风气，培养有用人才。推行新政，主要是研究西学，效法日本，探求“攘夷之道”。湖南维新运动如火如荼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了梁启超。

梁启超从上海抵达长沙时，时务学堂已招收了40名学生，建立了图书资料室，购买了一些教学仪器。由熊希龄任提调，西文总教习是李维格。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等都积极地参予到各项工作中来。梁启超亲手制订《学约十章》强调学以致用、全面发展，学习是为了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梁

启超运用康有为当年办万木草堂的经验，把湖南时务学堂办成当时最负盛名的一所学校。

此时的梁启超刚 24 岁，风华正茂，他积极地操劳于教学工作，给学生的批语有时上千言。在时务学堂这块自由的天地里，梁启超的思想渐趋于激进，他通过教学活动，大力宣传变法维新的理论，广泛地介绍西学，对封建顽固的旧学大加批驳，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时务学堂开办之后，共招考三次，收学生 200 多名。在梁启超等人的谆谆教导下，这些学生不仅学到了新知识，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年轻气盛，求知欲旺盛，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为梁启超的学识和激进的维新思想所折服，并逐步接受了梁效法西方、改革内政的主张。这些不怕邪恶的青年学生，还把梁的思想向外传播。通过时务学堂，梁启超等维新派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人才。如：唐才常等“庚子六君子”，李炳寰、林圭、蔡锷等。时务学堂的开办，直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对全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在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的同时，他也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有影响有实力的维新知识群体。为此，梁启超四处奔走，结交一大批志士仁人，试图造就一个革新势力。他结交的志士有四五十位，尤以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与梁最为要好，这些人皆为梁启超推动变法增添了力量。他在上海、两湖等地的朋友中，有知识分子、出版商、企业家，还有官僚、政客、买办及各界名流，这对他的维新事业确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从 1896 年到 1898 年百日维新前，梁启超将他的全部精

力都投入到维新活动中。1897年冬，在他的多方努力下，于上海创立了大同译书局，广译外国图书。大同译书局出版了大量中西文化书籍，为维新运动作了舆论准备，为民智、风气的开发提供了精神食粮，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897年，梁启超与汪康年、麦孟华等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同时在谭嗣同、经元善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创办了女子学堂，积极地从事一些开风气的社会改良运动，梁启超认为女子文化素质的水准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风貌，女子的聪明才智被开发，达到较高的文化层次，则中国民智随之开化了。他积极地呼吁解放妇女，提高妇女地位。梁启超发动的不缠足运动迅速得到广东、福建、湖南等地的响应。在进行这些社会改良事业的同时，梁启超还同黄遵宪等一起倡导“诗界革命”，要求诗歌从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和描写风花雪月中解脱出来，为改良主义的事业服务。在他们的倡导和亲自实践的带动下，我国诗坛的风气出现了大的变化。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一直在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告。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组织、推动和影响下，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局面，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中华大地出现了一线生机，为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戊戌变法

（一）策划变法

1894 年—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失败而告终，随之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股“实业救国”的热潮。不少地主、官僚、商人、买办、绅士都争相办工厂、开企业。清政府也从增强经济实力出发，加以鼓励，一时间各界人士都开始去投资近代企业。同时由于新式企业的优厚利润，更加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清政府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使得新式资本主义企业的开办存在许多不公平的地方，引起了民族资本家的极大不满，要求改革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新式企业与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对立与日俱增。

1897 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次年又强订不平等条约，由此掀起了一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沙俄、法、英都争相效仿，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他们在各自的“属地”，建工厂，开矿山，盘剥中国人民。随着一

批又一批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商品像潮水般地涌向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严重地威胁着中国还十分弱小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巨额的赔款和日益增加的外债，成为压在中国农民头上沉重的负担。

而清朝统治阶级却一再妥协，投降卖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工具。其内部是政治腐败，公开行受贿赂。大部分官僚不顾广大贫民的死活，横征暴敛，自己却过着穷奢极欲、奢侈糜烂的生活。这样，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起来。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迫于眉睫的亡国之祸，1898年1月，康有为上第五封与皇帝书，以血泪交织的文字描述了民族危机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提出“不变法国将亡”的警告。梁启超也上书清廷，要求对俄采取强硬态度，索回其侵占的旅顺、大连。面对亡国灭种的严酷现实，此时的梁启超、康有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促使清政府变法，他们已不惜牺牲一切。

维新派要实现自己的改良主张，必须要找一个政治上的依靠，获得一定的权力，康梁把这个靠山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光绪面对清廷江河日下的败局，他很想能有所作为。他了解一些西方的情况，具有开放意识。面对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军事势力的欺凌，他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以他的教师翁同龢为首的一些官僚也十分赞同和支持他的变法主张，希望清政府能通过变法走上富国强兵之道。

早在1888年，康有为的第一封上书虽未上达，但翁同龢读后大为赞赏。1895年，康第三次上书，由都察院转到光绪

手中，光绪读后，觉得颇合心意。随后，翁同龢走访康有为，商谈变法事宜，极为投机。1895年7月，光绪发布上谕，举办实业，不久又令广办学堂，培植人才，还命各地广泛地推荐人才。光绪积极变法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康梁等维新派。

光绪帝想召见康有为，询问有关变法事宜。但奕劻反对，认为“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乃小臣，皇上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光绪无奈，只好命李鸿章等五大臣传康有为谈话。面对五大臣，康有为侃侃而谈，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变法的总体设想。第二天，翁同龢将谈话情况向光绪作了汇报，光绪皇帝十分高兴，由于奕劻的阻挠，光绪只得令康有为如有建议书呈递。1898年1月，康有为上了第六书，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变法的三点要求：（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开制度局拟定新制，（三）设待诏所广开言路。同时又提议开设十二个局，推进变法展开。光绪帝对这个上书极为赞赏，之后，康有为不断向光绪提出新建议。

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支持光绪帝，将变法向前推动，康有为、梁启超认为必须成立一个带有全国性的组织。经过康、梁等一个多月的筹划，1898年4月，保国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通过了三十条章程，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维新派试图通过保国会的形式，广泛联络全国各地的维新志士，争取各级官僚。4月21日，保国会在崧云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梁启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在保国会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都成立起会社，变法之风盛行。但由于保国会成员复杂，组织松散，在遭到顽固派的破坏下很快就解

散了。但保国会对激扬民气、团结维新志士和宣传维新变法的意义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光绪皇帝新政的颁布奠定了基础。

（二）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百日维新”正式开始了。

新政颁布后不久，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参与维新变法。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垂询变法之事。这次对话长达数小时，在光绪接见臣僚上是极罕见的。随后，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特许专折奏事。

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当天即被清廷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按照清朝的惯例，举人被皇帝召见，就能赐翰林，最差也能得个内阁中书。按照梁启超当时的声望，仅赐了个六品官，据说是因梁启超不会“官话”（普通话），语言的障碍使他不能达意，失去了大胆建言的机会，以至和光绪谈话并不投机，深为遗憾。但也总算取得了参与变法的合法地位。

8月间，严复、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人都先后被光绪召见。9月5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任命为军机四卿，直接参与光绪帝的变法事宜。到此时，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改良主张终于可以通过光绪的名义得以具体实施，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命令，涉及到各个

方面，集中的体现了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改良主张。变法的内容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除旧，如废除八股，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废书院，裁绿营，撤消京内外一批无用衙门和淘汰政府冗员等。二是布新，如鼓励开矿和修铁路，改革财政制度和国家预算，奖励新著作、新发明，翻译书报，训练现代化军队，准许办学会、开报馆，广开言路。从这些内容可以清楚地表明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丝毫动摇封建政权的地方，它只是对清政府封建专制主义这棵大树作一些枝叶的修剪。即使如此，封建顽固派也是无法容忍的。

其实，从光绪开始策划维新变法起，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守旧派就坚决反对，他们视维新派为大逆不道。从保住自己的权位出发，他们反对任何改革。慈禧之所以在变法之初采取克制和容忍的态度，主要是因为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民族危机太严重，不满清政府的情绪高涨，慈禧企图让光绪折腾一阵子，缓解一下全国人民的情绪，然后找借口将光绪打下台去。许多守旧派的官僚有了慈禧这个后台，对她的心意也是心领神会，于是对光绪千方百计应付了事。而且，守旧派还基本掌握有实权，许多高级官吏的调任，光绪根本无能为力。光绪只能极有限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常要看慈禧太后的眼色行事。

1898年6月15日，即光绪下诏变法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为了阻挠光绪，胁迫光绪革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之职，其用心是极其狠毒的。当时翁同龢是光绪最信任的辅佐，又是光绪多年的老师，师生感情深厚，而翁同龢是全力赞同和协助他变法的。另外，翁同龢为官多年，德高望重，在

清朝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中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翁同龢一去，等于砍去光绪的左右手。然而手无实权的光绪无可奈何，挥泪送师傅。同一天，慈禧又逼迫光绪发布上谕，以后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都必须到慈禧那里谢恩。这样，慈禧又从光绪手中夺到了高级官吏的任免权，把中央的高级官吏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慈禧太后又任命其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的北洋三军，这样军队也被慈禧牢牢抓在手上。

从8月下旬，慈禧太后已经在暗地策划政变，推翻光绪皇帝。新政条款颁布后，严重地危害了守旧派官僚的利益，引起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用荣禄当时的话来说康梁已“天下共愤、罪恶贯盈”。整个官僚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对派。

9月初，慈禧为首的守旧派认为废掉光绪的时机已经成熟，派其亲信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预定10月份慈禧迫光绪一起到天津阅兵，借机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闻到风声后，心急如焚，然而自知力量单薄，难以对抗。9月15日，光绪借机让杨锐带出“密诏”，告之慈禧天津阅兵之阴谋，让康梁设法相救。梁启超想到维新事业还刚有点眉目，自己改良救国的抱负刚开始得以实现，而自己的政治靠山却面临如此危难，他知道一旦光绪被废，别想什么实现救国理想，恐怕生命也难保。²⁵岁的梁启超忍不住嚎啕大哭。为了挽救危局，康梁等维新派经过紧张的筹划，决定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认为有维新思想的“将才”袁世凯身上。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地主官僚出身。曾出使朝鲜，对外国有一定的

了解。甲午战争后，开始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练成了当时最有战斗力的新建陆军 2000 多人。从此有了政治资本，在军队中也有一定地位。戊戌维新运动兴起时，他进行政治投机，加入强学会，伪装赞同变法维新。康有为、梁启超都为其表现所迷惑，赞扬他“讲变法，通外情，是难得的将才”。为救光绪皇帝于危难之中，康、梁等维新派自然想到了握有军队的袁世凯。康有为派出亲信门徒去天津小站试探袁世凯，狡诈万端的袁世凯自然窥破来人的意思，极力吹捧了康有为一通，并且信誓旦旦表示站在维新派一边，效忠皇帝。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袁世凯的虚情假意深信不疑，于是，康有为、梁启超向光绪密荐起用袁世凯，以对付守旧派。光绪采纳了康梁的建议。9 月 16 日，光绪皇帝亲自召见袁世凯，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对其抚慰一番，肯定了其忠心可嘉，并擢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办练兵事宜。17 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要他和荣禄互不防碍，各办各的事，并授意一有“意外之变”，即带兵入京师。光绪的两次召见袁是希图以皇帝的眷隆换得其忠心。然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却自有他的打算，他深知自己已被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他必须慎重选择自己的道路。富于政治经验的老滑头袁世凯很快就断定光绪帝的力量远远斗不过慈禧太后，他决不愿意把自己的前程和性命托付给手无寸权的光绪皇帝和他那毫无成功希望的维新事业。所以袁世凯被两次召见后，分别拜见了刚毅、荣禄等慈禧的亲信，向他们暗示自己绝不会倒向光绪帝一边。同时他又显得镇定自若，不露半点风声。

9 月 17 日，光绪皇帝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密谕康有为

迅速出京。

9月18日，董福祥的甘军杀气腾腾地开进北京，政变的阴影笼罩着北京城。当日深夜，谭嗣同秘密来到北京西郊法华寺袁世凯的住所向袁世凯出示了光绪帝的密诏，要袁世凯在10月份天津阅兵时，杀死荣禄，保护光绪皇帝，恢复帝权。事成之后，许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之位。谭嗣同慷慨激昂地说，如果袁世凯不愿干，可以到圆明园向慈禧告发，获得富贵。袁世凯假惺惺地发誓要报皇上知遇之恩，声称救皇上也有他的一份责任，并极力表白他和荣禄决非同党，并向谭嗣同拍着胸膛保证：“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至此，天真的谭嗣同已经完全相信了袁世凯的谎言。他和袁世凯详细商定了救光绪的方案，一直到深夜3点钟，才离开法华寺袁世凯寓所。梁启超听了谭嗣同的讲述后，也深信不疑，以为救光绪帝指日可待。

9月20日，袁世凯返回天津后，立即把和谭嗣同商定的全盘计划报告了荣禄。荣禄立即星夜兼程，进京报告了慈禧太后。

9月21日凌晨，光绪帝被慈禧囚禁到中南海瀛台。随后第三次宣布垂帘听政，派兵大肆捕杀维新党人。顿时，“京都大乱，人人谣言不一”。

政变发生时，梁启超正在南海会馆同谭嗣同商谈袁世凯杀荣禄后他们将如何行动，正做着胜利的美梦。不料传来了清军查抄南海会馆、康广仁被捕的消息，他们知道大事不好。当时康有为已经出逃，谭嗣同从容不迫。梁启超劝他逃走，谭坚决不肯，梁启超在谭嗣同的劝告下，逃到日本使馆，日本

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将梁藏到一个秘密的屋子里。当晚，梁启超惶恐不安，彻夜未眠。22日，谭嗣同突然来见他，托付给他一些书籍和信件。谭劝梁启超赶快出逃，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显然，谭嗣同对梁启超寄予厚望。谭嗣同本来有充裕的时间可以逃走，但他坚决不走，并慷慨悲壮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两天后，被捕入狱。

9月23日，为了救光绪，梁启超和谭嗣同商议请求日、英、美等国公使出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困难，但都没有成功。

9月25日，谭嗣同、林旭、杨锐同时被捕。刘光第闻讯，亦自投入狱。谭嗣同在狱中，从容不迫，面对铁窗刀剑，他意气昂扬，留下一首烱炙人口的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走向刑场，被清廷残酷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年仅33岁，在临刑时，他神色不变，意态自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引刀就刑，演出了百日维新中最悲壮、最感人的一幕。

康梁等人逃走，六君子牺牲，大批维新人士或被捕入狱，或遭流放，到此梁启超等为之兴奋不已的百日维新，犹如一场梦，烟消云散。

五、亡命生涯的奋斗

（一）被迫逃出国门

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心情极度紧张。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是追捕维新党的军警。9月22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化装，在日本友人的护送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

天津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的地盘，戒备森严。据说梁启超刚下火车，就被盯梢的密探发现。只因他们行动迅速，才没有落入敌手。一连数日，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前暗探密布，梁启超根本无法脱身。9月25日晚9点，趁暗探放松警惕，梁启超等四人化装成猎人，偷偷潜出领事馆，上了海河上的一艘日本船内，急向塘沽驶去，准备乘日本商船，逃往日本。不幸还是被清廷暗探发现行踪，并被误认为是康有为，一队清廷巡警气势汹汹，以船上藏有康有为为名，逼迫该船回驶，日本人拒不听命，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辩，清廷巡警惧怕惹出中外交涉等麻烦，决定分兵两路，一部分赶回去

向荣禄请示，一部分随船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不料日本人迅速开船，26日早晨7点即抵达塘沽，恰巧旁边停有一艘日本军舰。日本人挥帽联系，梁启超等人迅速逃到军舰上。清廷巡警一不敢和日本军舰发生冲突，二也没有接到上司的命令，只好干瞪双眼，让梁启超等逃之夭夭。9点半，直隶提督聂士成，亲兵营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知县吕宗祥³⁰余人，飞奔塘沽车站。当得知逃犯已躲到日本军舰内，聂士成暴跳如雷，执意要上舰抓人。为了防止和日方引起冲突，经王、吕二位苦苦相劝，聂士成不得已只好作罢。随后，荣禄又派人往日舰交涉，要求放人，被日方一口回绝。26日午后，日本军舰启航，梁启超等人终于脱险。

这是梁启超第一次走出国门，此时刚25岁，回想自己这些年的奋斗，然而理想抱负不能实现，正义的事业遭到摧残，爱国的同志者遭到杀害，不禁潸然泪下。面对浩瀚的大海，碧波壮丽的海浪，梁启超眷念着家乡的父亲、兄弟和爱妻，想起他终身难忘的万木草堂和与自己一样生死未卜的恩师康有为，然而现在却是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报，不禁黯然神伤，写下了著名的《去国行》：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

却读东史说东故，三十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

王室蠢蠢如赘痛；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继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

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浦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纵，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这首诗反映梁启超当时忧愤、苦闷，而又不甘心失败的复杂心情。

梁启超抵达日本后不久，在英国人的协助下，康有为从香港转到了日本。师徒相见，不禁热泪盈眶，难以用语言描述彼此的心情。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得知清廷在以 10 万两银子买他的头，家已经被抄，亲族多被株连，为避难妻子李惠仙已携全家逃往澳门。梁在致李惠仙的信中，极力安慰贤妻，感谢她对自己事业的支持，倾吐夫妻间情深似海的爱慕之情。患难之情，真金难买，李惠仙的理解，支持和勉励，加深了他们的感情。1899 年，李惠仙也到了日本，夫妻团圆，恩爱有加。李惠仙总是从各个方面去关怀、理解、帮助梁启超，全力操持家务，千方百计分担丈夫的忧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梁启超事业上的成功，倾注着李惠仙的无数汗水和心血。梁启超对妻子也感激不尽，称他们是“美满婚姻，百年相爱”。

在日本，梁启超和康有为利用一切条件，继续为他们的政治目标而奋斗。他们广泛地结交日本各界人士，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他们还千方百计地从国内获取消息，了解清政府的动向和下层人民的呼声。与此同时，他们还广泛联系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的华侨，试图取得更多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为了交流的方便，梁启超还刻苦学习日文，经过半年的努力，可以较顺利地阅读报刊、图书，从此他广泛地搜集日本各方面的著作，潜心研究。梁启超这位敏锐的思想家，较戊戌变法时期更成熟和富于自己的独立思想了。

（二）策动“庚子之役”

戊戌政变对康梁等维新派是个巨大的打击。和平改良的道路受到阻碍，但他们还不死心，于是把维新的理想寄希望发动一场“武装改良”上。他们的基本设想是组织一股武装力量，捕杀慈禧太后，救出光绪皇帝，然后再借光绪的力量击败守旧派，实现变法维新。

梁启超准备发动这次武装勤王，主要依靠的力量是湖南的唐才常、毕永年等，当时毕永年是兴中会成员，联络了两湖的会党龙头，势力相当大，唐才常是谭嗣同的挚友，一向主张维新变法，具有反清思想。戊戌时期湖南的维新运动，他积极地参加，作出过一定的贡献。政变发生时，他应谭嗣同之邀，赴京增援，行至半途，闻京已变，只好转回湖南。

1899年3月，出于清廷的压力和本国的利益，日本政府将康有为驱逐出境。7月22日，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了保皇

会，在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华侨中发展力量，然后由康有为坐镇新加坡，通过在日本的梁启超指挥国内的唐才常，发动武装起义。

1899 年秋，唐才常到日本，通过毕永年见到了孙中山，唐才常准备动用武力、来“行大改革”的主张受到孙中山和许多兴中会成员的赞许。一些革命党人也应孙中山之命，参加唐才常起事的筹划活动。康有为、梁启超把唐才常的举动视为他们东山再起的关键，极力支持。

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康梁决定把起事的总指挥机关设在澳门，由何惠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负责。国内的主要事务由唐才常负责；唐才常和狄保贤偏重于上海和武汉，梁炳光和张学璟活动于两广。日本的组织联络工作由麦孟华、叶湘南、罗普、黄为之、麦仲华等负责。此外，徐勤奔走于南洋，梁启超则一方面负责筹款和大政方针的设计，一方面到美洲一带活动，以扩大影响，争取支持者。

在这次武装勤王的活动，梁启超来往于檀香山、美国和上海、东京间，异常活跃。他为了取得会党群众，还加入了三合会，对统一会党起了很大的作用。从 1900 年春天到 8 月起事失败，梁启超在筹款、联络和策划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00 年春天，唐才常、林圭等到达上海，具体部署长江流域的武装起事。发起组织“正气会”，其宗旨具有反清意识，同时又强调“爱国忠君”。不久，改“正气会”为“自立会”。

1900 年春天，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在山东、天津、北京爆发了规模宏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清政府举棋不定，剿抚两难。此时的清廷内外交困，危机四伏。面对这种局势，梁启超认为是难得的机遇，对自立军的胜利也信心百倍。他和康有为联系，取得英国政府的支持，试图说服手握重兵、暂时失宠的两广总督李鸿章脱离清廷，自组政府，建立“自立国”，拥戴光绪皇帝复辟。4月20日，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了一封长信，要康迅速赶往广州，借助外国军队，尽快起事。一旦冒险成功，大权在握，即可迅速向全国发展。恰好此时孙中山也想拉拢李鸿章，鼓动李搞两广独立。为了和孙中山的革命党竞争，梁启超让康有为抢先一步，到广东站稳脚跟。然而事实并不如一介书生梁启超所料想的那么简单。

1900年6月，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天津失陷，北京危在旦夕，清廷内部一片混乱。面对发生了变化的列强的利益关系，英国政府从自身的在华利益考虑，决定放弃对康梁和自立军起义的支持。老奸巨滑的官僚李鸿章也绝不会愿意背叛清政府，当慈禧太后命他北上议和时，他也从命了。这样，梁启超的“拥广东自立”的如意盘算就全部落空了。每每事与愿违的局势令梁启超“忧思如结”，苦闷不堪，康有为、梁启超看到起事已成功无望，就不打算将筹集到的30多万巨款用到自立军身上，便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拖延办法。

唐才常等人并未意识到梁启超态度的变化，他们已联络了10多万会党群众，积极谋划起事，准备先夺取武汉。7月26日，唐才常在上海联合社会名流80多人，成立中国国会，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负责日常事务。发表了既否定清廷，又拥护光绪的自相矛盾的政治

纲领。8月初，自立军要起事的消息已经风传开来。张之洞等清廷官员已加强了防范。唐才常本想立即起事，因等待康梁筹集的军费，只得一再延期，不能按计划发动起义。7日，大通的自立军在机密泄露的情况下，仓促起事，很快失败。于是，唐才常决定无论如何，23日起事。不料由于计划为张之洞所侦悉，22日，唐才常等20多人被张之洞逮捕，壮烈牺牲，自立军也很快被血腥镇压。

自立军的鲜血使许多人警醒，一批有为的热血青年开始放弃改良主义的立场，坚定地站到革命派的一边。革命党人也接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改良主义在中国是绝对没有前途的，只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中国才有希望。在改良主义道路上苦苦求索的梁启超，等待他的的是一个政治道路的重大决策。

（三）办学和办报

梁启超在政治上每每失败，但他在教育和言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他支持自立军起义的同时，已尽最大努力筹办学校，发行报刊。

日本横浜的大同学报，在梁启超流亡日本后，邀请他出任文士，为该校一切大政方针的主要设计者，对此校的建设梁启超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899年春，梁启超还在神户创办了同文学校，招收华侨子弟入学，效果颇佳。不久，梁启超又从培养人才、推进维新事业考虑，决定开办一个专门高等学校，为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和各地华侨子女提供一个进一

步深造的场所。经过梁启超的多方筹集经费，1899年9月，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正式开办，招收学生30多人，梁启超任校长，聘请了日本人作教师。所开课程，门类繁多，内容颇新，和湖南时务学堂相比，较注重西洋文化的传播。在这些学生中，有11人就是当时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教过的学生，其中有蔡锷、秦力山、林圭、李炳寰等。他们之所以到日本来，也是在梁启超的帮助下。当时梁也拿不出太多的钱来帮助这些学生，只能让他们艰苦一些，但这些学生都很勤奋，志气极为高昂，学习兴趣也异常浓厚。在梁启超的精心教导下，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该校培养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为政坛的风云人物。

梁启超另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办报。早在1898年12月，梁启超就创办了《清议报》，该报基本反映的是梁启超亡命日本后头三年的精神风貌。《清议报》内容充实，形式灵活多样，发行量在3000册以上，行销日本、南洋、朝鲜、欧美及澳大利亚等，清廷虽屡次禁止，但该报在中国本土的销售量一直居首位。梁启超利用这个宣传阵地对清廷极力抨击，对清朝统治阶级的腐朽、贪婪、卖国、独裁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在报上发表文章，大谈民权，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谈论国事，历数国家的耻辱，讲破坏，论革命，这些和当时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界的心态息息相通，因而博得了“海内外有心人称许”。不少青年人，通过读《清议报》获得了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产生了反抗清政府的革命思想，而这一点是和梁启超的本意不相符的。但在客观上，《清议报》开民智、倡民权恰

恰符合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1902 年元旦，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后又创办了《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内容更加广泛，专栏多达 25 个，涉及到各个方面。出刊后以其新颖、广泛、生动、动人的特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一时供不应求。1903 年发行达 9000 份，后又达 1.4 万多份。梁启超备受鼓舞，为《新民丛报》撰稿不遗余力，有时一天写 5000 多字。他那新颖的观点，独特的见识，严密的推理，扣人心弦的评述，文情并茂的语言，使一大批青年倾倒。可以说梁启超的文章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影响了那个时代。梁启超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19 世纪和 20 世纪交替的数年中，随着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忧国忧民，不满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带来国势的衰弱，向往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希望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他们又无法找到思想上的武器，梁启超的言论一定程度上起着反传统、思未来，出一言而为千百万人热情高呼，发一论而使全国人赞不绝口的效果，他的言论为广大初涉尘世又渴望有所作为的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食粮，成为他们“智慧的源泉”。

其实远在 1896 年，梁启超任《时务报》总撰述的时候，就因为他热情有力地宣传维新的文章而名声卓著了。但是，从总的来看，直到流亡日本之前，他基本上是以康有为的忠实追随者而出现于政论文坛的，他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亡命日本后，梁启超努力学习世界的最新知识，深刻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思想开始突破康有为学说的藩篱。

1901年前后，梁启超的政治观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像康有为，死守过去的观点，一成不变。1903年之前，梁启超的思想激进到几乎和革命派一致的程度。他通过《新民丛报》对清廷及慈禧太后不遗余力地进行鞭挞，对专制主义无情地加以批判。他还大讲革命，谈破坏，礼赞武装斗争。甚至认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大革命、大破坏。在1901年前后那种国难当头的日子里，梁启超的言论是大快人心的。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灵魂的体现，通过它梁启超逐步树立了在舆论界和学术界与日俱增的地位。《新民丛报》也反映出梁启超日渐成熟的学术思想，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初年新生的方向。后来，梁启超在政治上逐步滑落，站到了和孙中山等革命派的对立面，但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仍闪着熠熠光彩。

梁启超一直是十分重视小说在启迪民智中的特殊作用的，他认为把政治见解寓于小说之中，有很好的宣传效用。因此，在创办《新民丛报》的同时，梁启超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报》。梁在《新小说报》刊发了各种各样的小说作品，甚至连他自己也开始写起小说来。一个时期内，梁启超刊出的那些小说还真吸引了不少读者，起到了一定的舆论宣传作用。

（四）和孙中山的交往

梁启超赴日后的四五年中，先后访问了檀香山、澳大利亚和美国，眼界大开。

1899年12月20日，梁启超由日本横滨乘船，奔赴美国的檀香山，目的是发展自己的组织，推进维新变法。此时的梁启超刚二十六七岁，英姿勃发，展望未来的事业，颇有几分踌躇满志。

梁启超在檀香山停留半年，到处集会、演讲，宣传其救国的改良主义主张；其间，还引出一段风流浪漫的爱情故事来。当时在梁启超的保皇会里有一檀香山商人，商人有一位芳龄20岁的美貌女儿，名叫何蕙珍。该女子颇有几分文才，尤其精通西方。梁启超初次见到何蕙珍，并未在意。但由于梁四处演讲，不通英文，只得请何蕙珍代为翻译。通过多次接触，梁启超逐渐开始注意起蕙珍来，何蕙珍不仅长相漂亮，行为举止也高雅得体，谈吐不凡，梁启超不由得心中暗暗钦佩。当时檀香山有不少人并不赞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观点，时常有人用英文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梁，梁启超心中不服，但无法用英文辩驳。然而没过几天，报上连载反驳文章，梁启超惊喜异常，却不知是何人所作。有一天晚上，何蕙珍的父亲请梁启超到家中赴宴，当地的许多官吏名流皆来作陪，梁启超侃侃而谈其改良的政治主张，何蕙珍以流利明快的英语为他翻译。梁启超非常感激蕙珍的帮忙，更觉其“目光炯炯，

一绝好女子也”。散席后，何蕙珍趁送客的机会，大胆地紧握梁启超的手，含情脉脉地向梁表白了爱慕之情，并且向梁启超索要一张照片。何蕙珍还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驳的文章底稿拿给梁看，梁启超为何小姐的文才和一份痴心所感动。几天后，梁启超如约将照片送给何，何蕙珍也回赠了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的小扇。此时的梁启超已坠入情网，自称“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不知何故也”！

然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潜移默化影响多年的改良派首领，他已无法突破封建婚姻的藩篱。半月之后，当一好友劝梁启超娶一懂英文的女子作夫人，这样往各地活动更方便些。梁一听即知是指何蕙珍。他当即一口回绝，并陈说了三条理由。一是梁已有妻子，并曾和谭嗣同等人组织过一夫一妻世界会，绝不能再娶；二来何小姐英姿勃勃，才华过人，亦不能作妄想；三是梁某奔波海外，有国难归，其一举一动，为世界关注，不能因小失大，败坏名声，更不可连累何小姐。何况清廷到处捉拿梁某，哪能有一个安定的家庭！随后，梁启超让好友转告何小姐他的感激，并将为她选一佳婿。不料，这位好友告诉梁启超，何小姐自从见到梁后，就已决定终身不嫁。这使梁十分为难。数日后，何蕙珍的英文老师宴请梁启超，蕙珍作陪，两人促膝长谈。从兴办女学到中国妇女解放和人种素质，从儿童教育到社会改革，从中国文学到欧美风情，无所不谈。面对如此有才华、有抱负而又痴心相托的美貌姑娘，梁启超实难抑制心中的爱慕之情。握手道别回寓，梁启超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自称：“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

几乎不能自持。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 28 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情。”

最后，梁启超用理智战胜了感情，拒绝了何小姐真诚而炽热的爱。后来他致信李蕙仙，讲述了此事的经过，求得妻子的理解。从小受封建伦理教育的李蕙仙却建议梁娶何小姐为妾，被梁启超一口拒绝了。这样这场甜蜜、痛苦而浪漫的恋爱风波就平息了。

1900 年 7 月，梁启超从檀香山返回日本，密赴上海，此时唐才常等人已被捕，梁觉得形势危急，赶往新加坡向康有为请求对策。9 月，澳大利亚保皇党邀请梁出访，梁启超在澳大利亚停留八个多月，每日不是交游，就是演讲，或者组织会众，或者向大亨筹款，十分忙碌。梁启超在那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许多华侨，尤其是青年把他当作崇拜的偶像。1901 年 5 月梁启超返回日本，思想趋于激进。

1903 年 2 月，梁启超开始了他早已梦想的美国之行。他先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后到蒙特利尔，再驶往美国的纽约，先后游历了美国的十几座城市；历时九个月，初步了解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情、习俗以及华侨的衣食住行，对梁启超以后的思想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正确比较中美的社会差异，得出了中国不能行革命，建共和，而只能走改良主义道路，站到了时代潮流相对立的一面。

当时的孙中山是力主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派领袖，他对康梁这一派维新势力极为关注，千方百计争取康梁，希望共同革命。早在 1893 年，主持万木草堂的康有为在中国知识分子

中已经颇有点名气了。其时，孙中山正在广州、澳门借行医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很想结识康有为，就托友人向康有为转达致意。不料康有为惟我独尊，狂妄异常，非要孙中山具门生帖子，拜他为师。孙中山愤其妄自尊大，严词拒绝，这样，中国近代这两位伟大人物一生都没有会面。但是孙中山仍然没有放弃与改良派合作的愿望，他还多次邀请梁启超参与一些革命派的事务，都为康有为所阻拦。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孙中山不辞辛劳，热情奔走，为营救维新派脱险尽了最大的努力。康有为、梁启超到日本后，孙中山试图说服他们放弃改良主义，把两党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但康有为异常顽固，一心要报光绪帝的“圣恩”，始终不肯放弃改良主义的主张。但不久，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离日远赴南洋。此后，梁启超便成了维新派在日本的首领，孙中山和梁启超是同乡，比梁大7岁，孙一向十分器重梁。梁启超主持在日的维新党事务后，他并不像康有为那么固执己见。并且，出于对顽固派的仇恨，他甚至趋向于革命派的主张。梁启超赴檀香山之前，他和孙中山有多次交谈，商讨合作，双方私人交往也颇密切。一时孙康合作之声浪，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梁启超进而与兴中会员陈少白商议两党合作的计划，后来推陈少白和徐勤共同草拟两党合并的章程。但徐勤、麦孟华等是最坚决的保皇党人，他们对梁启超这种违背康有为意志的作法大为不满，暗中激烈反对。他们写信给康有为说：“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相救不可”。当时康有为在新加坡，得信后大怒，立即派人携款赴日，促使梁启超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不敢违抗，遵命

赴檀。临行前梁还约孙中山共商国事，并表示两党一定合作到底。

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与那里的大量华侨关系很深，联系甚广。梁启超便请孙中山写信介绍同志，孙中山坦然不疑，便写信给其兄德彰及其他诸友。梁启超到檀香山后，就拿出孙中山的亲笔信，受到当地华侨的热情欢迎。梁启超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逐步地熟悉了情况，结交了朋友。其间，梁启超还写信给孙中山，再次表白他倾向革命的思想。

1902年后，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压力增大，同时，梁启超在政治上逐渐落伍，对革命和破坏主义逐渐持否定态度，把昔日攻击顽固派的矛头转向革命派，遂背叛了和孙中山“合作到底”的诺言，在1903年底与孙中山彻底决裂了。

遗憾的是，梁启超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还玩弄两面派的手法，用革命和保皇同出一途的理论去欺骗华侨，并且捐集了巨款，作为保皇会的活动资金，这样就把孙中山辛辛苦苦在海外建立的一些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孙中山察觉后，痛斥梁的失信。1903年冬，孙中山亲赴檀香山等地，发表演讲，撰写文章，揭露了梁启超的阴谋。

从此，梁孙成为政治上的仇敌。

六、立宪派的主帅

（一）与革命派的论战

1903年，梁启超游历欧美以后，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完全放弃了先前大肆鼓吹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全然站到革命的对立面上。他认为“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他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根本不能享受民主自由，中国不能走革命的道路，而只能实行开明专制，走改良的道路，从而梁启超又“义无反顾”地把脚步跨向了改良，回到其师康有为的怀抱。

1904年秋到1907年秋，梁启超以改良派首领的身份，领导了一场与革命派针锋相对的论战。他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连篇累牍，洋洋洒洒，宣扬政治革命论，鼓吹“开明专制”论，反击“社会革命论”，全面而系统地阐发了他对抗革命的政治思想。

梁启超作为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认识都表现出不彻底和软弱的一面。他一面热情礼赞革命，一面又惧怕革命的破坏；既热情地倡导民权，又

不敢全盘否定君权；既颂赞自由竞争，又鼓吹强权政治。他思想中的这种消极因素终于把他从革命和改革的徘徊中拉回到改良中来。

在与革命派的唇枪舌战的激烈论争中，梁启超提出的总论点是：在当时的中国，最重要的不是改变现行专制制度，而是培养国民素质；不是进行有破坏的革命，而是搞切切实实的改良。面对梁启超这种软弱倒退的反革命言论，革命派奋起反抗，汪精卫等人以《民报》为阵地，发表文章对《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文章展开进攻。

在这场辩论中，革命、保皇两派在国内外 20 多种报刊上先后都投入了论战，论战的主题有三个，一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二是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三是要不要“平均地权”，解决土地问题。

在这场大论战中，梁启超取代康有为成为改良派的旗手和统帅，提出了三个改良主义的观点：一是政治革命论，他主张的政治革命是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认为政治革命的唯一手段是“要求”，即无须触动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让统治者自行改革，他极力反对用暴力和革命手段搞“政治革命”。二是“开明专制”论，他把开明专制区别于清朝的野蛮专制，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又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如同他把“政治革命”的重点放在人民要求上一样，梁启超把“开明专制”的实施希望寄托在人民的“劝告”上，他是希望先实行专制，再达到民主的境地，天真地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清朝政府的觉悟和发善心上。三是反“社会革命”论，社会革命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

出来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解决中国社会的土地问题。梁启超加以错误和歪曲地理解，他认为对社会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而非土地，反对消灭封建大地主，害怕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希望能在不改变现行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

梁启超的这些对清朝统治者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政治主张受到革命派坚决的驳斥。与革命党论战三年后，以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为标志，宣告了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的彻底失败。论战失败后，梁启超蛰居横滨乡下，心境凄楚悲凉。

这场大论战，使革命的主张深入人心，大大提高了革命派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信，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失败在于其逆时代的潮流而运动，改良主义的老调已为时代和人民所唾弃。

（二）立宪运动

1905年以后，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首先是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政党登上政治舞台，从此中国大地出现了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清朝统治阶级已预感到严重的统治危机。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俄国的惨败而告终，这一结局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引起人们的震惊和思考，当时的人们认为日本之所以先败中国，再败沙俄，就是因为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而中国、沙俄却是君主专制国家，中、俄之败于日本，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专

制之败于立宪。这个论证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当权派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个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曾经被视为“邪说”的立宪制竟能成为济世救国的灵丹妙药。

1905年7月，从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出发，清朝驻法公使孙宝琦及洋务官僚署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先后奏请清廷实行立宪，清政府也意识到，立宪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了。

1905年7月，清政府终于挂出了“预备立宪”的招牌。经过紧张的筹划，决定派尚其亨、李盛铎、载泽、戴鸿慈、端方等五人出洋考察宪政，虽然革命党人吴樾在前门车站用一枚炸弹的巨响延搁了大员们的行程，到10月下旬，五大臣终于联袂出洋了。11月清廷命政务处五大臣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政治馆”。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欧、美、日游逛了一大圈后，于1906年8月返回国内。9个月的考察使大臣们对立宪制颇有好感，载泽在给那拉氏的奏折中就极言立宪之好处。那拉氏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并召开“御前会议”反复策划，决定实行预备立宪。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终于发出“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谕旨宣布“大权统于朝廷”，当前的任务也不是立即实行宪政，而应首先改革官制、整顿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待“数年后规模初具”，“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后方可实施宪政。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就这样开场了。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中竭力维护封建君主的特权，只改变一些无关痛痒的制度，并且把立宪预备之期拖延到遥远的未来，其虚伪和欺骗性是

十分明显的。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立宪党人都没有看清楚清廷的欺骗性。他们真诚地欢呼清廷的这一伟大举措，认为是政治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他们与预备立宪相呼应，建立起各种立宪组织广泛宣传立宪主张，开展大规模的国会请愿活动。要求迅速实行立宪，希望立宪能够按本阶级的意志得以实现。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三）组织政闻社

正当梁启超为与革命派论战的失败而黯然神伤的时候，清廷下诏预备立宪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避难海外的梁启超顿时欣喜若狂，变得踌躇满志活跃非凡了。他一改几年来和革命党论战中宣传的开明专制和预备宪政的思想，主张迅速立宪，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更好地监督和参与立宪，梁启超趁机提出组织政党的主张。康梁主张建立政党，一方面是为了统一立宪派力量，从而推动清廷实行宪政；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保皇党控制整个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争夺国内地盘。梁启超联合了杨度、熊希龄等人进行组党活动，并将保皇会更名为“国民宪政会”，后又改为“帝国宪政会”。非常遗憾，梁启超的如意算盘由于立宪党人内部的派系权力争端而又宣告落空了。这是由于1906年12月，张謇等人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抢先把国内立宪派集合到自己手下。1907年春夏间，杨度又和康梁发

生争夺领导权的冲突，只得分道扬镳。于是梁启超只得另和蒋智由、徐佛苏等人筹措组织一个政闻社。

1907年10月，梁启超起草的《政闻社宣言》发表。《宣言》直言不讳地标出政闻社的四条政纲：

- 一．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
- 二．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 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 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之权利。

梁启超为了防备清廷的干预，他还一再表明心迹：“政闻社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10月17日上午，政闻社在东京神田举行成立大会，参加者近2000人，梁启超特地从横滨赶来，在会上发表了演讲。革命派极其反感梁启超的陈词滥调，演出了一场革命派与改良派挥臂抡拳的打斗闹剧，成立大会不欢而散。

开端的不吉利并没有丝毫动摇梁启超办好政闻社的热情和信心。成立大会后，社员纷纷被派遣回国活动，广泛联络各地影响所及的华侨、士绅、学生各阶层，开会演说，通电请愿，把迅速立宪的舆论，造得充塞朝野。

1908年1月，政闻社将总部迁往上海，进一步加强了在国内各地的活动，并发起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要求清政府速颁宪法，早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本来是个骗局，政闻社的活动自然使统治阶级十分恼火。

另外，康有为与政闻社在国内鼓动的请愿活动相呼应，于1908年夏天，上书请愿，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要求，立即引起

清廷的“骇怪”和恼怒，恰好这时康梁的宿敌袁世凯为报复康梁的“倒袁”活动，面奏慈禧，声称政闻社系康、梁等发起，同时又“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廷告发康、梁乱政秘谋。”这样，慈禧终于震怒了，于是借政闻社社员陈景仁通电请愿，弹劾吏部侍郎于式枚之机，大作文章，革陈之职，并以“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谋煽乱，扰害治安”之罪，宣布取缔政闻社。

政闻社成立不足一年就宣告夭折，给梁启超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仍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关注和控制国内运动的发展，国内各种名号的立宪组织，在梁启超等人的直接鼓动和间接影响下，纷纷地建立起来。

（四）宪政、财政和外交思想

梁启超是立宪派的灵魂，是国内外立宪活动实际上的指导者。梁启超自己深知这一点，并以此自许和自负。当时由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和洋务派摇身一变而来的伪立宪派，对于宪政自然是一窍不通的。著名的五大臣在国外“考察”了大半年的宪政，连个考察报告都写不出来，只得暗中请还处在被通缉状况下的梁启超代为起草。在清廷“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发布之后的第二年春，法部尚书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亲自致书梁启超，求教宪政学理，希望梁能“开其鄙塞”。

梁启超在宪政问题上是有最大发言权的，他确实担负了指导国内立宪运动的责任。1909年12月，各省咨议局代

表在上海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梁启超特派徐佛苏参加并常驻上海，担任与国内各立宪团体和议员的联系事务，促使他们在咨议局中努力建议发言，并缩短立宪年限。徐佛苏根据梁的旨意，在立宪党人中积极活动，扩大了梁启超一派的影响。不久，徐佛苏到北京，主持了由各省咨议局议员筹款创办的《国民公报》，梁对此深为满意，并寄予很大希望。梁启超还亲自为该报撰文，精心指导着国会请愿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1910年3月，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又创办了《国风报》，成为继《新民丛报》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阵地。梁启超继续发挥其以言论影响政治的特长，为国会请愿活动推波助澜。

1911年，对国会请愿日益失望的各省咨议局代表在京成立了宪政团体“宪支会”，徐佛苏被选为总会常务干事之一，宪支会以团结立宪党人、促进政府速开国会、培养宪政知识为主要任务，梁启超悉心地指导和支持该组织的发展。在整个宪政运动中，梁启超精心指导了运动进程的每一个实际环节，而且发展了他一系列的宪政理论思想。

梁启超认为，立宪政治的实质是政府对国会负责，召开国会为宪政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开设国会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已成为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梁启超论述道：国会的法律性质，在于“为制限机关与主动机关相对峙”；国会的政治性质，在于“代表全国人民各方面之势力”；国会的功用，在于“以奖励竞争之形式，行调和竞争之精神”，最终以“国民全体之意思，为国家意思”。梁启超十分注重国会的职权，他提出在法理上，国会应拥有如下之权力：一，参预

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决议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策之权；四，事后承诸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在政治上，国会最重要的职务“在于代表民意，监督政府”。

梁启超主张实行英国式的二院制。他提出，上议院由皇族议员、敕选议员、蒙古族议员和代表各省的议员组成，其核心应是代表各省之议员。下议院应通过人民的选举而产生。这种选举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应该是普选。他反对选举中的阶级限制、财产限制和教育程度限制。

可以看出，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大体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规划中国未来的，应该说梁启超关于中国未来国会的构想对丰富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宝典是一个贡献，标志着梁启超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及其理论的认识已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在指导开展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同时，梁启超还对财政学和财政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大量文章，开创了资产阶级财政学之先河。

梁启超把财政问题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的。他认为国家的一切事业都与财政息息相关，因此选举理财的人才为极其重要的。他从爱国的立场出发，特别地关注清末的财政问题。他深入地研究了近代财政学的基本理论以及西方各国举办公债的经验，还研究了货币的职能和历史，考证了中国古代的币材，提出了一套资产阶级近代财政理论。他还提出了财政改革方案，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顿赋税，使税收增加并趋于合理。二是整顿币制，改变币制混乱给政治

带来的危害。三是节省财政经费，反对清王朝荒淫腐朽的浪费。四是举办和利用公债。客观地讲，梁启超的财政思想虽然没有其得以实现的社会制度，但其理论上的成就却是无法否定的。

另外，梁启超还潜心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了他的“名誉孤立”的外交政策。即对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不结盟，不偏正，以“中立”为原则，以“平衡”为目标，以便在各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均势”中，在帝国主义矛盾的夹缝中求自己的生存。

梁启超认为，当时国际局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的外交是一种弱国外交，不能无异于强国的外交政策。在列强的竞争中，弱国要生存，必须对列强不偏不倚，严守中立，以保持国际格局的均势，此外别无他法。中国的外交显然只能走这种弱国外交的路子。梁启超极力批驳当时人们针对英、法、俄、日协约“以谋我”的状况而提出的联德、联美之说。

平心而论，梁启超提出这样一条“名誉孤立”的外交政策，其主观动机乃出于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爱国之心是毫无疑义的。作为一个矢志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并非要求得到列强的普遍欢心。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他之所以提出此策，就是为了“卧薪尝胆，以求一脱竞争客体之地位，进而至竞争主体之地位”，以最终达到“内治”的目的。可以认为，外交为改良政治服务，为爱国服务，这一点在梁启超身上是坚定不移的。他在分析国际格局及中国在其中所处位置的前提下提出不结盟、自立自强的外交方针，就外交原则讲，

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能和李鸿章等的“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的外交方略同日而语。当然也不能简单地把梁启超划到亲日、亲美派之行列。

不过，在各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而软弱无能的中国统治阶级当权派只得以帝国主义意志为转移的局势下，所谓的“中立”、“均势”、“平衡”只能是一厢情愿，清政府无法接受。梁启超的外交梦，也不过幻想而已。

七、和袁世凯的合作

（一）政变计划破产

1910 年的夏秋之间，梁启超为了获得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积极谋求清政府开放党禁。他通过活动游说于王公贵族之门、鼓动国会代表、提议于资政院等多种途径，希望使清政府大发慈悲，捐弃前嫌，开放党禁，赦免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的“逋臣”们。由于顽固派的极力反对和袁世凯等的从中作梗，这一活动又告失败，使梁启超异常愤懑。

1911 年 5 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成立了“皇族内阁”，预备立宪的骗局暴露无遗，也打破了立宪派企图从清政府手中分得权力的梦想。梁启超毅然决定利用统治阶级内满族亲贵间的相互倾轧，发动一场宫廷政变，除掉奕劻、载泽等顽固派。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革命形势迅速向全国发展，各省纷纷响应。年底，湖南、湖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上海、广东、四川等 17 省相继宣告独立。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洪流，猛烈冲击着腐朽的清王朝，反动的清王朝土崩瓦解。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归国，被齐集南京的 17 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组建了临时政府。1912 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革命运动，推翻了统治中国 200 多年的满清王朝，结束了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同时也促成了中华大地一次伟大的思想转变。

辛亥革命的成功给国内立宪派以极大的震动，他们一反过去叩头请愿、拥护清王朝实行立宪，反对革命的姿态，积极响应革命，和革命合作，挂起拥护共和的招牌。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梁启超所始料不及的，起义的枪声打乱了他的“宫廷政变”的计划。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他坐卧不安，忧心如焚。他认定当前的形势危急，必须立即行动，把对局势的主动权先于革命党人抢到自己手中。

经过审慎的权衡，梁启超调整了先前拟定的政变计划，精心制定了“用北军倒政府，开国会，挟以抚革党”的新的行动方案。按照梁启超的设想，此举如果成功，不但可以解除革命的祸害，而且能使国会得到实权，实现立宪党人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宪政理想。

梁启超实施计划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派人回国运动各省独立。按照梁的部署，其同仁、信徒开始四处奔走、活动。在立宪党人的努力下，立宪派占优势的省份，山东、广东、上海、西南等地纷纷换旗独立，由各省督抚出任都督。梁启超派出亲信加紧运动，并函告徐勤力筹巨款。他还企图运动吴

禄贞、蓝天蔚、张绍曾的部队，和戟涛、良弼的禁卫军，控制北京，推翻皇族内阁，组织起由立宪派掌握大权的新内阁，夺取北方地盘，安抚南方的革命军。梁启超对吴禄贞寄予厚望，亲自致信，希望他能将中国“起其衰而措诸安”，梁启超却不知晓此时的吴禄贞已是革命党人，对时局的看法与他各异。

就在梁启超刚开始北军倒政府之计划实施时，国内局势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新情况。10月29日，“滦州兵谏”发生，驻滦州的新军第20镇统领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约同其他新军将领，通电清廷，提出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制定宪法，赦免国犯，消除皇族特权等，电文中态度极其强硬，声称如果清廷不允，就要率兵进攻北京。同一天，山西省宣布独立，袁世凯又趁机提出极其苛刻的出山要求。清王朝内外交困，手足无措。10月30日，清廷处于各方面的压力，被迫下诏罪己，并同意组织责任内阁，不任亲贵。同时宣布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第二天，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全权筹组新内阁。

梁启超见到清廷上谕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他再一次调整了行动方案，将“用北军倒政府”的计划进一步发展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梁启超提出八字方针，可以看出他在辛亥革命政治立场的重大转变。

虽然“和袁”是基于对新内阁的错误估计，但他能和死对头袁世凯弃却前嫌，可见其救治策略变法之大。更明显的是他“慰革”、“逼满服汉”，反映出他日渐主张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激进政治立场。

梁启超为达到操纵国内局势，最终实现群宪政治的目的，制定了“八字方针”后，又毅然决定亲自回国指挥。在逃亡日本 13 年后，1911 年 11 月 6 日，梁启超怀着“前所布画，今收功将半”的欣喜登上日轮“天草丸”号，启程回国了。11 月 9 日，“天草丸”号顺利抵达大连，熊希龄得知梁启超抵达大连的消息后，就派人前去迎接，自己也马上从北京赶回奉天。10 日，梁启超赴旅顺，当夜即乘汽车匆匆抵达奉天郊外，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进入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此时，袁世凯已就任内阁总理，并调动军队猛攻汉口，给革命军以重创。为了稳住北方局势，袁世凯还卑鄙地派人用重金收买杀手，11 月 6 日在石家庄刺杀了在北方活动多年的革命党人吴禄贞。梁启超原想雄心勃勃地大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刚刚把双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失去了所有计划中最寄厚望的力量。此时袁世凯不仅从清朝统治者手中夺到了全部兵权，而且牢牢控制了禁卫军，使梁启超寄予一线希望的载涛、良弼等也无机可乘。于是梁启超又把希望寄托到“滦州兵谏”的张绍曾、蓝天蔚两人身上，企图用张、蓝的实力恢复京城秩序，梁还和时任奉天督练公所总参议的蒋方震多次接洽。随后，梁启超准备离开奉天，此时梁在北京的活动分子汤党顿、罗惇谓匆匆由北京赶来，报告张、蓝“滦州兵谏”已于 11 月失败的消息。原来袁世凯杀吴禄贞后，便将张绍曾解职，并把滦州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其他将领或撤职或调离，解除了他们手中的兵权。11 月 14 日，蓝天蔚也接受清政府官僚赵尔巽的免职，被逼往江南进行所谓的考察，这样“滦州兵谏”就宣告失败了。此时，熊希龄从大连几次电告梁启超，催促其赶紧离开。事至

如此，梁启超不得不打消入京计划，在汤觉顿、熊希龄等人的一再催促下，梁启超逃返日本，至此，梁启超策划的政变计划彻底破产。

（二）“虚君共和”方案的失败

武昌起义爆发后，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惊恐不已，最令他担心的便是列强的武装干涉。于是他立即撰写了10篇总题为《救亡论》的文章。对辛亥革命抱着“惴惴恐惧，惧中国之亡”的心情进行攻击，指责革命会带来动乱、民生惨状和外国干涉，坚持认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只有保存皇位，建“虚君之共和国”，才是最好的方案。当时该文寄至上海，由于其内容诋毁革命，未能发表。

梁启超秉承康有为的旨意，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和其师兜售“虚君共和”的主张。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名为“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之问题”，下篇名为“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之问题”。梁启超在文中反对联邦制，力主单一国体，认为“今后新中国所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共和政体之种类很多，究竟采用何种政体最适合中国之国情？

首先他列举了美国、法国、瑞士等六种不同的共和政体，并且加以比较分析，他说：第一，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实际上是共和专制政体，必然导致君主专制政体，是“最可恶者也”；第二，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如瑞士，适于小国，不适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第三，人民共举大统领而大统

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如美国，此“共和政体中之最劣者，只可行诸联邦国，而万不能行诸单一国，否则，每当竞选总统，必至于酿乱”；第四，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实无责任之共和政体如法国，此制优于美制，因为选举大统领，不用全国报票，纷争之范围较小，统领无责任故无权力，人不乐争之，故纷扰之程度减，他还指出此制政府更迭频繁，政见屡摇动之不足；第五，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如英国，此制又优于法制，英王与法总统都居政府与国会之外，但英王不加入政党，法总统借政党之力以得选，常见党以滥用职权，或明或暗，牵制总理大臣，造成政界起伏不定，内阁更替频繁。

梁启超最后的结论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较为“圆妙”，这种制度虽“有一世袭君主”，并无实权，“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必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那么君主既无权，似若一土木偶，为什么要设此“虚君”呢？梁启超认为最高统治不用经常竞选，“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因此，梁启超得出“虚君共和”政体最适于中国的结论。

那么，选举谁为君主呢？梁启超认为旧皇室“人心尽去，举国皆敌”，已经不适宜。他却别出心裁地把孔子的后裔“衍圣公”请出来，或者“熏穴以求君，则将公爵加二级，即为皇帝”。若清室宣誓立宪，也可以给以虚位。

从梁启超整个“虚君共和”理论来看，虚君共和不过是君主立宪的代名词，反映了他在革命大变动时期进退失据的思想状况。

《新中国建设问题》发表后，梁启超开始努力争取实现“虚君共和”的方针。他致电袁世凯内阁，希望奏请清廷“改中华国，从汉姓，立集国会，定国体。”同时又遥控国内，派同盟党回国，广泛联络，希望把清朝的军阀官僚、革命党人都纳入他的“虚君共和”的轨道。

12月初，盛先觉受梁派遣携梁启超致章太炎的长信由日本抵达中国上海。按照梁的指示，他所运动的对象主要是章太炎和宋教仁，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盛先觉两访宋教仁不遇，再访时宋教仁已到南京就职于南京临时政府。章太炎对康、梁那一套“虚君共和”理论也极不感冒，认为是“愚者之见”。

梁启超同时还派蓝公武和罗惇谓运动于北方，他们运动的对象是署邮传部大臣梁士诒和资政院总裁李家驹。通过二人，蓝、罗与袁世凯取得了联系。但此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了。袁世凯久有废清自代的野心，议和时又得到革命派方面“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的明确表示，所以他根本没有保存清帝名号的热情，他对康、梁一派做出的姿态，不过是“别有所图，虚与委蛇”而已。同时革命派坚决不接受梁启超的“虚君共和”之论。

1912年1月19日，与康、梁周旋的梁士诒伙同民政大臣赵秉钧、外务大臣胡惟德上奏，要求废君主制度，实行共和。2月，南北双方达成协议：清帝退位，革命党人选出袁世凯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至此，梁启超苦心孤诣经营的“虚君共和”方案又不得不宣告失败。

（三）制定“联袁”方案

政变计划的迅速破产和兜售“虚君共和”活动的失败，使一向颇为自信的梁启超无所适从。他认识到赤手空拳的海外立宪党人要想在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有所立足是极其困难的，为了谋求本派的发展，面对复杂而又冷酷的现实，梁启超最终作出了联合袁世凯的决择。梁、袁本来积怨极深，这一方针的确立，使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统治阶级当权派的关系在一个时期内发生了质的变化。

改良派和袁世凯发生关系之始大致在维新变法时期。袁世凯投机于维新事业，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又卑鄙地出卖维新党人。对袁世凯这个可耻的告密者，导致“戊戌六君子”喋血的历史罪人，康、梁是耿耿于怀，恨之入骨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把倒袁作为己派的奋斗目标之一，为此展开了种种活动，加深慈禧对袁世凯的疑忌。但最终还是没有斗过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袁世凯搞垮政闻社，并使梁启超等人其后谋划开放党禁的活动成为一枕黄粱。

新仇旧恨加到一起，使康梁同袁世凯的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在两天内相继死去，引起朝野种种揣测。谣传光绪为袁世凯所害，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显然值得怀疑，但康梁等人却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海外发布檄文，通电讨袁，在朝野间激扬起一个倒袁暗流。恰好此时光绪之弟，摄政王载沣当权，借机将袁强行罢官，开缺回籍。康梁恨尤未解，梁启超还频频致书王公亲贵，历数袁

世凯之罪状。康有为甚至考虑是否鼓动舆论“迫请杀之”。袁世凯一时臭不可闻。

谁能料想，武昌起义的炮响会给袁世凯带来官运的大好转机。本来袁世凯在三年前就离开北洋，但其心腹却仍牢牢控制着北洋大权。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借机东山再起，并一举控制了清廷的大权。梁启超之所以作出“联袁”的决择，显然是看到在政局急转直下的变化中，在对付清朝统治和革命派力量上与袁世凯有若干共同点，因而感到暂时可以利用，把袁世凯作为平定因革命而动荡起来的中国局势的一支力量。

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组成，其中的重要职位上当然都是他自己的私党。但也给其他派势力留下几个徒具虚名的位置，以表示他“不遗贤才，共济时艰”的诚意和苦心。袁把张謇、杨度、梁启超等立宪派领袖都列入其内阁，为了促使梁启超能返京入阁，就任法部次官，袁世凯一改先前痛骂康梁为叛国逆臣的词调，对梁启超大加吹捧。梁启超起先由于难料袁世凯的前途，再加上当时热情致力于活动“虚君共和”之计划，本不打算就任，后来，“虚君共和”计划泡汤，而袁世凯的势力日益增大。1912年2月12日，清廷下诏宣布退位，15日，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此，环顾宇内，梁启超就作出了联合袁世凯的决择。在同党们的催促下，梁启超决定行动。

梁启超先致电袁世凯，祝贺其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继而袁大肆吹捧，谓之“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之后，他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财政上，大借外债，统一货币为

虚金本位制；政治上，他要求袁世凯以清王朝的旧官僚集团为中坚，大量任用旧立宪派，拉拢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动摇分子和温和派，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要诀在于操纵舆论，搜罗党羽。

这不啻向袁世凯献上了一份治国安邦的厚礼。随后，梁启超向袁世凯发出了归国合作的讯号，梁、袁书信电报往来频繁，梁还派汤觉顿到北京面见袁世凯，详述梁启超对时局的看法和建议。

在经过一番活动、疏通后，在国内各团体、党派及方方面面的体面电请劝驾之下，1912年11月中旬，梁启超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

11月16日，梁启超抵达天津，受到北洋军政大臣张锡銓及唐绍仪等人的欢迎。三天之中，登门拜谒者多达200多人，“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梁启超兴奋不已，说“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辐集前途气象至佳也”。

11月28日，梁启超离津赴京，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其热烈的欢迎。

回到北京后，梁启超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派广泛联络，握手言欢。为原立宪党人撑腰打气，指示方针政策。在北京期间，北洋军阀的官僚、政客、立宪党人以及商会、民众团体等，为他举行了一系列的欢迎活动。12天中，光欢迎会就达20多起，在这些频频举行的欢迎会上，梁启超即席演说，慷慨陈词，拥民国，赞共和，颂扬辛亥革命，仿佛已成为革命的首要功臣和真诚的民主共和派。但他骨子里还是念

念不忘其改良主义的老调，他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意义后，得出改良派和革命派虽然手段不同，但实质是相辅相成，革命之所以得成功，乃两派人士协力同心。

在他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把革命派和清王朝的殊死搏斗描述得轻飘飘的，极力饰美己派。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称颂共和，也只不过是对其现状的妥协和迁就，是为了应于时势，顺乎民心罢了。

在他的演说里、文章中，他还表达了对民初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本来，革命风暴在打破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也带来暂时的社会危机和混乱，这是在所难免的。梁启超却偏激地把造成这一切混乱和危机状况的原因归诸于革命暴力和革命派，时不时地对革命加以诋毁，拐弯抹角地攻击革命派。

可以认为，民国初年的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较先前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他的政治理想仍然是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他不反对民主共和，但反对马上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他主张通过强有力的人物，在共和的形式下，运用专制的手段，把国家逐步引上资产阶级宪政的轨道。至于这个强有力的人物，梁启超自然是看好大总统袁世凯的。

在“开明专制”思想的指导下，梁启超开始了和袁世凯的合作。

（四）进步党领袖

梁启超与袁世凯合作是希望通过袁这个握有强大实权的

统治当权派，在“共和”的形式下，运用专制的手段，把国家引上宪政的轨道。要以一个立宪党人首领去赞助支持袁世凯，梁启超自然需要一番理论开脱，于是他又提出了他的“国权主义”。主张“国权”，抑“民权”，他认为“国权”重于“民权”，“民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权”。他又提出“畸重国权”，即加强中央政府首先是统治阶级当权派的权力，其实质乃迎合袁世凯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给中华大地带来了一股民主的潮流。在革命后的一年多内，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在过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较为民主的新生活，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新局面，其主要标志是风靡朝野的政党政治。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无不借机发表政见，组织政团，以求在新的权力分配中争得一席之地，一时间出现了一个组党热潮，党派社团林立，关系盘根错节，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政团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经过复杂的斗争、较量、分化、组织，到第一次国会选举之前，基本上形成了4个较大的党，即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

在这几个党中，又形成了日渐明朗的两大对立的阵营。一是以孙中山、宋教仁等为代表的原同盟会系统的激进派政党国民党。它积极推行与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强调民权，反对专制，属于进步党。一是以原立宪派为主，包括部分旧官僚、地主士绅及部分革命党人在内的保守派政党，强调国权，拥护或依附政府，力主政治渐进主义，得到袁世凯的鼎力支持，其妥协性颇为明显。两个阵营的对抗反映在党派斗争上，一方是民主党、共和党和统一党的三党联合，另一方是国民

党。

梁启超和保守派政党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他不仅是民主党的主脑和幕后主持人，在共和党中他也处于无可争辩的指导地位。因此可以说梁启超是民初保守派政党的灵魂。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出于专制独裁的根本目的，极力赞助和支持保守派政党的发展。还派亲信党羽加入之，给予财力上的资助，其目的自然在于拉拢为己所用。

梁启超归国后，袁世凯积极支持他筹组大党。1912年12月，正式国会开始选举。为取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宋教仁主持的国民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均获压倒优势的胜利，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保守党三党合占的席位尚不及国民党的2/3。以专制独裁为目标的袁世凯和视国民党为“乱暴派”的保守派党人都感到了切实的威胁。为了对抗国民党，在袁世凯的支持和梁启超等人的奔走、筹备下，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个保守派政党终于合并组成了进步党。梁启超也成为进步党的实际上的领袖，该党的政纲和大政方针皆依梁启超的国权主义及政党政治的主张而制订。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的成立，使国会内出现了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对峙局面。从总的来看，进步党是明显向袁世凯一方倾斜和对袁专制主义的迎合。这在处理宋教仁案和对善后大借款的问题上反映得尤为充分。

宋教仁本来是国民党实际主持者，力主政党内阁制，反对总统制。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为使国民党获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他遍游了长江中下游各省，发表演讲，抨击时政，

鼓吹政党内阁，甚至还揭露袁世凯，指出他在不久肯定会背叛国民。选举结果出来后，袁世凯极其恼火也害怕宋教仁出来组阁与他分享权力。于是，袁世凯采取卑鄙手段，派武士英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惨遭刺杀，全国人心鼎沸，国民党人知有政治背景，无比愤怒，一致要求严惩凶犯，查明真相。袁世凯不得不令江苏地方政府查办，而“穷究”主犯的结果，其幕后策划者就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大总统袁世凯。一时全国舆论大哗，南方报刊更是纷纷载文揭露袁世凯阴谋颠覆共和制的罪行。袁世凯恼羞成怒，准备大借外债，以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力量。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国民党议员们的阻挠，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借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

本来，梁启超视宋教仁为中国现代第一流的政治家，认为他的死是国家之损失。同时也认识到善后大借款丧失主权，是国家的奇耻大辱。但他从联袁的目的出发，采取了偏袒袁世凯的态度。在进步党对时局的讨论会议上，梁启超抛出了拥袁为正式大总统；不反对大借款，但要监督其用途；宋案由法律来解决的三项意见，得到通过。可见，梁启超为达到联袁的目的，不惜充当袁的工具。他对袁的专制主义的迎合，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进步党对袁世凯的支持，还表现在对“二次革命”所持的态度上。袁世凯获得大借款后，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的革命力量。孙中山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力主武装讨袁，但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未能及时发动。当北洋大军大举南

下，进驻江西时，国民党人才被迫讨袁，打响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由于国民党缺乏明确的纲领，内部涣散，再加上国际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二次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战争是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一次努力，是正义而具有进步意义的。但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却极力诋毁这次革命，攻击为“破坏”行为，是“头脑简单、办事盲动”的幼稚行力，认为唯一的途径是实行开明专制，支持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很显然，梁启超还是从联袁的目的出发进行讨好。

然而，进步党人对袁世凯的大力支持，却并未换来袁的好报，这在“二次革命”后的内阁改组中就可看得一清二楚。

（五）第一流人才内阁的下场

宋教仁案的发生及其被揭露，使赵秉钧内阁濒于崩溃，再加上进步党因奥国借款参与弹劾政府的活动，袁世凯不得不同意改组内阁。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认为这是他们出面组阁的绝好机会，四处活动，谋求出山。而袁世凯却心中自有打算，尤其是总理这一要职，他是绝不愿让与北洋军团毫无关系的人担任的。他原想请前清老官僚徐世昌出来组阁，但遭到国民党和进步党国会议员的激烈反对，再加上徐也不肯从命，只得作罢。此时，对南方的战争还没结束，正式大总统的选举也没举行，暂时利用进步党彻底战胜国民党，攫取专制权力当然不无好处。于是，袁世凯最终选择了进步党人

熊希龄来组阁。

熊希龄当时任热河都统，不愿就任。梁启超则认为组阁是扩张党势的大好时机，极力怂恿熊希龄就任，并且表示自己愿意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给熊希龄以实际上的支持。在梁启超的热情鼓动下，熊希龄终于答应出任内阁总理。谁知当熊希龄兴冲冲地跑去与袁世凯磋商阁员名单时，袁世凯已经把外交、陆军、海军、财政、内务委了他的私党孙宝琦、段祺瑞、刘冠雄、周自齐和朱启钤，只剩下司法、教育、农商等几个闲职让熊希龄去安排。

梁启超一向对理财之道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宏大的抱负，当他看到满心热望的财长位置变成了泡影，立即像泄了气的皮球，坚持不就袁世凯给他安排的教育部长之任，并且拒绝入阁，几乎使内阁筹组破产，急得熊希龄几次三番地跑去劝说于梁。

反复斡旋，几经折冲，加之袁世凯的让步，财长的位置让熊希龄兼任，梁启超终于同意入阁。这样，一个由进步党人和北洋派势力联合组成的混合内阁就成立了。熊希龄就任总理兼财长，内务朱启钤，外交孙宝琦，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交通周自齐，司法梁启超，教育汪大燮，农商张謇。由于内阁成员中梁启超、汪大燮和熊希龄都是社会名流，张謇是闻名全国的实业家、教育家，所以这个内阁便被人称之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成立使梁启超颇感兴奋。在他看来，自己运动组成的内阁虽不是由进步党人独立组成，但毕竟为进步党人参政、施展政治抱负提供了一席之地。自己虽然没

有当上财长，但总算没有让北洋派夺走财长之位，也已是过得去了。

梁启超是“第一流人才内阁”的灵魂，他亲手起草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作为内阁的施政方针。内阁宣言书对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各项都制定了基本方向。应该说，梁启超为内阁制定的施政方针是以把国家引向建设为根本目的的，体现出浓重的资产阶级色彩，表明了进步党人建立资产阶级理想国家的热情，算得上是一个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梁启超、熊希龄、张謇等人也的确想循此方针，有一番作为。但是，这与袁世凯的政策相距太远了，他想要的是扩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建立封建独裁统治。所以，这个大政方针作为计划还可以，而一旦付诸实施则阻力横生，流弊百出，面目全非。第一流人才们根本无法实施大政方针。

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打败国民党之后，迫不及待地要变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本来按规定，正式总统必须在国会制订宪法后依据宪法选举产生，宪法未定之前不能选举。袁世凯为了早日攫取大总统的宝座，1913年8月，指使一些议员接连向国会提出先选举总统案，同时策动黎元洪联合14省都督致电国会，要求速选总统。当黎元洪电催梁启超时，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在内外压力下同意先选总统，并派人与国民党议会协商，于9月5日在国会会议上通过了选举总统案，附合了袁世凯的违法行为。

袁世凯对此仍不放心，10月6日，国会正式投票选举总统时，袁采用卑鄙手段，逼迫议员们选出袁为正式大总统。此

后，袁世凯再也不需要什么国会来限制他的权力了。11月4日，借口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有联系，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从此不足法定开会人数，事实上只得停止活动。

国会被迫停止活动后，袁世凯还不罢休，12月初他设立了御用的“中央政治会议”，将国会的立法权夺了过来。1914年1月10日，他便公然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这样民国的第一届国会就这样被袁世凯给葬送了。

对袁世凯这一切反民主的粗暴举措，以梁启超为首的“人才内阁”却是默默地许可和顺从。更为甚者，当袁世凯决心解散国会，国会危在旦夕的时候梁启超却落井下石，撰文攻击国会。这里，固然有梁启超重政府轻国会的国权主义理论在作祟，但也看出他对袁世凯专制主义行为的附合迁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梁启超无论如何都没想到，国会的命运很快也降临到“人才内阁”和进步党人的身上。对于以专制独裁为总目标的袁世凯来说，政党、内阁都不过是手中玩物。

当“人才内阁”以其勃勃雄心推出他们的大政方针时，他们发现根本无法付诸实施，方针成了一纸空文。1914年初，袁世凯指使各省都督攻击责任内阁制，倡行总统制。1914年2月，由于内外各种原因，最主要是袁世凯的暗算，仅存五个月的“第一流人才内阁”被迫下台。

（六）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

梁启超任“第一流人才内阁”司法总长时期，曾经想为改良中国的司法状况作一番努力。梁启超提出了司法独立的主张，并设计了具体实施方案，无奈梁启超追求的司法独立毕竟与专制独裁水火不容，以袁世凯为首，上上下下形成一股反对司法改革的强大阻力，随着“人才内阁”的下台，梁启超改良司法的理想又付之东流了。

梁启超辞掉司法总长之后，袁世凯鉴于他一贯怀有理财的大志，便委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当时梁启超对袁仍抱有幻想，他认为只要袁氏真正实行“开明专制”，便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梁启超欣然接受了这一闲职。

梁启超一向把币制金融改革看得相当重要。他确实希望能在币制局总裁的任上有所建树。因此，他接到袁世凯的委任状后，立即就职，并拟定币制局简章七条呈文递交袁世凯。随后，他又以满腔的热情拟定了一系列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规章。梁启超在财政金融方面是颇有见地的，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自然也很有现实价值。然而以袁世凯为首的专政独裁实力，根本不愿接受他的建议。

颇想有所作为的梁启超最终还是有理想而无建树，有计划而无法施展，这不能不令人沮丧、失望和愤懑。1914年底，梁启超不得不呈请辞去了币制局总裁。

辞职后的梁启超在幽静的清华园里送走了1914年，迎来

了1915年的新春。面对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回想自己及进步党人与袁的这段合作道路，梁启超反思再三，感到极为失望。他开始认识到要想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实在是痴心妄想，与袁世凯的合作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

然而，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对袁世凯的行径越来越不满，但却不想公开反对袁世凯。他最担心的是反对袁世凯会助长革命兴起，所以只好保持现状。在闲居清华园的日子里，梁启超对两年来的投笔从政合作于袁世凯的政治实践进行了反省，后悔这一段不光彩的从政生涯，决心弃政从学。

1915年1月，梁启超发表了《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第一次发出了脱离政治的宣言。梁启超决定从事文化教育，专以理论的研究贡献于国民。他不再鼓吹先前极力宣扬和坚持的“国权主义”和“开明专制”论，而提出了“社会教育”的救国思想，从1914年冬起，梁启超就躲开喧闹的官场，埋头于著述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写下《欧洲战役史论》，他还曾预言德国必然取得战争的胜利。

本来梁启超还拟定编写一系列关于世界战争的丛书，然而此时袁世凯掀起的复辟封建帝制逆流却甚嚣张，猖獗一时。梁启超感到，与其坐而论道，袖手旁观，不如起而行动，奋起反抗。为了自己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梁启超决定抛开那张墨汁未干的脱离政治的宣言，离开著述的书桌，重新投身到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

从此，他开始了他一生中极有光彩的一段政治生涯。

八、护国战争

（一）帝制逆流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 200 多年的大清王朝，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原清王朝的老官僚袁世凯窃取。袁世凯虽然宣布“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但他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做他的皇帝梦。1913 年 7 月至 1914 年初，袁世凯用武力击败了国民党，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扫荡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象征的国会、省议会和地方自治，踢开了进步党的“第一流人才内阁”。此后，他越来越加紧了帝制的准备工作。

国会解散后，对袁的专制独裁最大的限制就是《临时约法》了，袁世凯决定对它开刀。1914 年 3 月，在他的授意下，约法会议对《临时约法》进行修改，把总统权力规定得同专制皇帝一样。约法会议还帮袁制定一部《新约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他的专制独裁。

1914 年 5 月 1 日，袁世凯按照《新约法》规定，废除了

国务院，在大总统府设立了政事堂，特任徐世昌为政事堂国务卿，襄助总统办事。各部总长除例行公事外，一切事务须经国务卿核阅，转呈总统定夺。袁的独裁制度得到加强。

5月8日，袁世凯裁撤了总统府军事处，成立了“陆海军元帅统率办事处”，由袁亲自过问，掌管全国军事。同时还在军队中建立起一支绝对忠于自己的“御林军”——模范团，排挤陆军中段祺瑞的势力。

5月26日，袁世凯又设三个御用的参议院，由袁自己任命了70名参议员。除了前清元老和袁世凯的宠贵外，进步党的熊希龄、梁启超也名列其中。这个参议院又代行立法院，进一步为袁世凯的无限权力立法。

8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了《总统选举法》修正案。其中规定：总统任期10年，可以连选连任，下届总统由现任总统提名。这就把具有专制皇帝权力的总统变成了形式上也像皇帝的终身和世袭总统。但这一切还不是袁世凯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总统到皇帝的过渡环节。

1915年8月，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流氓古德诺写了一篇文章，胡说中国的国情民俗只宜实行君主制而不宜实行共和制。袁的法律顾问、日本人贺长雄也抛出文章，鼓吹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集权于袁世凯，才不致分裂。

与之相响应，袁世凯通过其心腹授意与袁关系密切的杨度网罗了一批名流，组织起“筹安会”，为帝制唱赞歌。此后，帝制逆流急转直下，袁世凯的爪牙们组织起形形色色的“请愿团”，恢复帝制的请愿书如雪片般飞向参议院。

9月中旬，袁世凯又授意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要

求参议院召开国会解决国体问题。此后，各省纷纷举行国体投票。11月20日，各地投票以赞成君宪国体、一致拥戴袁为皇帝宣告结束。12月，代行立法院的参议院便“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半推半就，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并改元“洪宪”。

袁世凯登基之后，为巩固其政权，从文化上大搞复古活动，搬出孔子为其帝制正名。同时为了获得列强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权益，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逆历史潮流的行径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袁世凯本来想通过帝制进一步集中自己的专制权力，更好地取得列强的支持，更稳固地统治中国人民，使袁氏王朝万世长存下去。然而他所料不及的是自己已经身在漩涡之中了，反帝的浪潮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

（二）与袁世凯决裂

辞去币制局总裁后的梁启超，虽然不满袁世凯的许多倒行逆施，但他还对袁抱有幻想，对袁的态度总是批评与合作。

1915年初，袁世凯汤山小宴上试探梁启超，梁启超义正词严，断然反对帝制，袁氏极为不快。“二十一条”的签订，令梁启超义愤填膺，拍案而起，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和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引起日本当局的大为恐慌，企图对梁加以收买，为他严词拒绝。对袁世凯他也明确地表达了批评与反对；不愿再与袁合作。袁世凯曾任命他为政治顾问，梁启超坚持

不就。派他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他也不予理睬。

梁启超对袁世凯的反对日益明朗。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中的大部分条款，并自欺欺人地搞“元首外交成功”的欢庆活动，梁启超极其气愤，撰写《痛定罪言》，质问政府的卖国行为，指出袁世凯对目前的屈辱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复古逆流梁也进行了无情的驳斥，指出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梁启超对袁世凯为攫取专制权力而公然摧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一切形式的罪行，表示了深恶痛绝。并警告袁氏政府改过自新，好自为之。

梁启超对袁世凯完全绝望了。

梁启超和袁世凯的携手合作，是想依靠袁之实力统一中国，推行立宪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尽管他觉察到帝制复辟的端倪，但他开始并不希望袁世凯倒台。1915年4月，梁启超南下广州省亲，便转到南京，约同冯国璋联袂进京晋见袁世凯，奉劝袁不要搞帝制。袁世凯言辞恳切，信誓旦旦自己绝无此意。后来的事实完全与袁世凯的誓言相反，梁启超忍无可忍，决定公开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筹安会出现后的第七天，梁启超连夜起草一篇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反击复辟封建帝制的逆流。《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草稿写出之后，其内容立即被袁世凯得悉。袁先派人贿赂梁启超20万元，央求梁放弃发表该文，被梁婉言谢绝。杨度还会想请蔡锷以师生之谊劝梁不要发表此文，为蔡锷拒绝。随后，袁世凯又派人威胁梁启超，要他回顾十多年的亡命之苦，不要自讨苦吃。梁启超笑而答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使

袁世凯派来的走卒哑口无言，狼狈而退。接着，各种陷害恐吓的匿名信接连飞来，梁泰然处之，不为所动。

9月3日，北京英文《京报》汉文部刊载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在社会上引起极其强烈的震动。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主要是反对和批判猖獗一时的复辟封建帝制逆流，反对和阻止袁世凯称帝，对袁世凯政权几年来以权弄法和近年公开复辟封建帝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在文章中，梁启超极力反对变更国体，他认为国体变更一会带来革命和破坏，二会造成君主专制。针对复辟论者当时“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的反动论调，梁启超依据自己的国体政体观进行了深刻地驳斥，揭露袁氏改行帝制就是恢复君主专制的实质，揭露复辟者所谓建立君宪政体的骗局。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标志着梁启超公然打出反袁旗帜，也正是他对袁世凯政治上完全绝望的表现。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他们反对二次革命，支持大借款，赞成袁世凯打击国会。但是，袁世凯过河拆桥，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统治，对支持过他的资产阶级的意见与要求却不屑一顾，严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自然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在梁启超身上自然表现在与袁世凯的决裂上。

梁启超利用其社会声望，鼓励其门生党徒打消对袁世凯的畏惧情绪，“敢为天下先”，果断起兵，武装讨袁。

1915年12月，梁启超在与其学生蔡锷等密谋武装反袁后，南下上海。行前，他致袁世凯一封长信，再一次奉劝袁

世凯放弃帝制，并警告袁不要逆世界潮流，以免引火烧身。

1915年12月23日，在袁世凯称帝后的11天，蔡锷等人在云南誓师反袁，护国战争开始了。

（三）策划西南发难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898年，他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读书，以优异的成绩得到时任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的器重和赏识，蔡也对梁极为崇仰，视为知己，同时也深受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梁、蔡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戊戌变法失败后，蔡锷受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召唤，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士官学校学习。1904年回国，曾先后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习。1905年，他调任广西，历任新军教官和长官，对训练新式军队颇负时誉。1911年，被调任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协统，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策划云南起义，被推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和云南军政府都督。1913年5月，进步党成立，蔡锷被推举为进步党本部的名誉理事和湖南支部的部长。

蔡锷在民国后与袁世凯的关系上，和其师梁启超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从真诚拥护、真心合作到灰心失望，走向决裂的过程。蔡师从梁启超的国权主义，认为“袁是中国的一个人材，能把中国治理好”，愿意让袁做一个终身总统。二次革命爆发后，参与了袁对国民党的镇压。但这并没有获得袁世凯的信任，1913年9月，蔡锷奉调来京，被袁世凯挤掉滇督职

务，改任为几个虚职。蔡锷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了。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卖国行径的日益公开化，蔡锷对袁氏也渐渐丧失信心。筹安会出笼后，蔡锷终于看清了袁的庐山真面目，也最后下了反袁护国的决心。

梁启超走上反袁的道路后，亲自把“讨贼”的领导任务承担起来，要完成反帝护国的重任，梁启超当然知道最需要军事上的支持，他自然而然地想起蔡锷这个在军界中深有影响的弟子。

1915年8月18日，梁启超与从北京赶来的蔡锷一同到汤觉顿的住所，连夜密商了倒袁计划。此后，每隔数日，蔡锷便由京赴津一次，与梁启超筹商反袁部署。同时梁很快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为反袁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按照梁启超的指示，蔡锷迅速做好离京准备。他一面做着武装讨袁的准备，一面又做出与其师梁启超分道扬镳的假象。当梁的反袁鸿文发表后，蔡锷逢人便说：“先生是书呆子，不管事实，只顾空论”。当袁氏党羽拿着帝制意见题名簿向他试探，他毫不犹豫地写下赞同。为了迷惑袁世凯，他装出无所作为，故意沉迷于酒色，经常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和云吉班妓云小凤仙打得火热。在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后，1915年11月中旬，他机智地摆脱了袁世凯密探的监视，悄悄离开北京，避居天津租界。梁启超和蔡锷商定，决定梁去两广，蔡锷回云南，同时派王伯群、汤觉顿分别先期赴滇、粤做准备。

1915年12月2日，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蔡锷改穿日

本和服，更姓名，登上日轮东渡日本，然后改乘船经上海吴淞口转赴香港。12月19日，蔡锷终于辗转到达昆明。此时的云南，反袁声势也日益高涨，蔡锷的到来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使反袁的各派势力联合起来。然而，此时形势出现了意外。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决定派特使赴日本，出卖更多的国家利益。梁启超得到这个消息后，为防止袁氏与日本的交易成功给护国战争带来更大的阻力，他决定抢在袁日交易之前，发动起义。

12月22日，蔡锷、唐继尧等云南重要军政要人在接到梁启超立即起义的指示后，召开会议商讨大事，与会的39名将领歃血为盟，立誓反袁护国。

12月23日，唐继尧等向袁世凯发出警告，最后通牒的电文，口气极其强硬，要求袁杀杨度、刘师培等12人以谢天下，并废帝制，拥共和，限袁25日10时前答复。袁世凯当然不可能轻易改变立场。12月25日，唐、蔡联合电告袁，指出袁“背叛民国”，即日云南宣布独立。

12月27日，蔡锷等发出讨袁通告，揭露袁世凯的丑行，号召全国一致行动打倒他。12月31日，蔡锷、唐继尧联合发出梁启超起草的《云贵檄告全国文》，历数袁氏辛亥4年以来操纵党派，蹂躏国会，撤弃约法，出卖主权，叛国称帝等19大罪状。檄文写得尖锐犀利、正气凛然，很具号召力。

1916年元旦，蔡锷率领护国军主力开赴四川前线。

护国战争爆发后，梁启超已由天津秘密抵达上海。梁密切关注着战争的进程，作为这场运动的主帅，梁启超对所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在军事上、财政上、舆论上，

梁启超动员他所有的力量对云南的护国军进行指导和支持。同时他还极力鼓动冯国璋赞助云南起义。冯国璋时任江苏将军，本是袁世凯的亲信，但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势力的增强，他也开始做总统梦。对袁氏的帝制，他是持反对态度，再加上袁世凯也开始对他猜疑、防范，他对袁也不满起来。梁启超争取他赞助云南起义，是想稳定东南，孤立袁氏。所以梁一到上海，就派人持自己亲笔信和冯联系，详述义军情形，晓以利害。冯国璋同意决不与护国军开仗。此后，冯又乘广西独立之机，与江西将军李纯等八将军联名致电袁氏，要求速行取消帝制，给袁很大的打击。

梁启超的这些精心策划与指导，无疑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战争的胜利进行。

（四）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成立

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兵分三路挺进四川，所向披靡，1月21日攻克川南重镇叙府。1月27日，贵州响应，宣告独立，给了护国军有力的支持。

西南形势的发展令袁世凯震惊不已，他立即调派占有绝对优势的北洋军进行征伐。当时蔡锷率领的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卒，与十数万的北洋军在四川泸、叙之间进行着十分艰苦的战斗，护国军的处境十分困难。

面对危急的形势，坐镇上海的梁启超心急如焚，他看出，必须迅速策动广西独立，使滇、黔、桂连成一片，改变力量对比的形势。1916年2月25日，梁启超致书广西都督陆荣

廷，力劝他迅速响应云贵，宣布广西独立，陆荣廷本来对袁积怨很深，加之他对梁启超久慕盛名，极为推崇。于是陆派人至上海告梁，只要梁一到广西，陆荣廷即刻宣布广西独立。为了护国大业，梁启超决定冒险入广西。

3月4日，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梁启超一行7人乘日本横浜丸号邮船离沪南下。为了躲避袁氏特务的侦察，梁启超日夜蛰伏于舱底，在旅途中梁还不辞劳苦，起草文告，代拟广西独立通电，逼袁世凯退位的最后通牒以及未来南方政府军务院组织条例等。3月7日，船抵香港，此时才发现原定行程受阻，现在经越南入桂的道路已被封锁，此时又传来护国军失利的消息。梁启超不得已兵分两路，一路是汤觉顿等5人由香港经梧州先期赴南宁。另一路由黄溯初陪同梁启超偷渡海防，再转广西。

3月12日，梁启超秘密换乘日本运煤船，离开香港，16日晚在海防登陆。当时，在越南的法国人受袁世凯之托，正严密捉拿梁启超，为了防备不测，梁启超在日本人办的牧场中隐藏10天，梁不幸感染了一种极危险的热病，险些送命。梁启超的广西之行，可谓历尽千辛万苦。

早在梁启超抵海防前的14日，汤觉顿一行已经抵达南宁。陆荣廷得知梁已在赴桂途中，遂于3月15日发出了由梁代拟的广西独立通电。同一天，陆将柳州的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府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部，并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

广西独立无疑对袁世凯是重大的一击，对整个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鼓舞了护国军将士的士气，使护国军连连取得胜利。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北洋军阀也要求停战议和，护国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3月26日，梁启超躲过“谍骑四布”的越境，于次日午后踏上国土，受到广西军民极其热烈的欢迎。4月4日，梁启超终于抵达南宁。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但他还赖在总统的位子上不走，梁启超决意要以袁世凯退位作为和谈条件。梁启超抵南宁后，即全力策动广东将军龙济光的独立。龙是袁世凯安在南方的一个钉子，是袁矢志忠贞的走狗之一，他是决无半点讨袁的诚意的。其时在广东省内，中华革命党人，国民党温和派组织的反袁武装，占据了除广州的大部分地区，军锋直逼广州。龙济光迫于形势，假意宣布独立。广东军民看出龙根本无讨袁的诚意，纷纷要求其下台。开始，梁启超也坚持广东非去龙不可。到南宁后，因感到龙济光是陆荣廷的儿女亲家，碍着面子，也从有利于组织两粤护国军出师北伐袁世凯方面着想，梁启超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广东问题。

4月8日，梁启超和陆荣廷由南宁起程赴粤，调停广东内部的统一。4月12日，龙之部将枪杀了以陆荣廷代表身份参与和谈的汤觉顿，这就是震惊一时的海珠惨案。各路军民群情激愤，力主驱逐龙济光。梁启超、陆荣廷无奈只得向龙济光发出“让出广州都督并率师北伐”的最后通牒。

为尽快结束广东内部的混乱局面，于5月1日，梁启超策划在广东肇庆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由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都司令部统管广东、广西两省军务。此举主要是针对龙济光不肯让出都督之位，都司令部的成立一

定程度壮大了反袁力量的声势，为军务院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为了统一反袁复国力量，梁启超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政府性质的军务院。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后，梁正式提出军务院的组织计划，终于求得滇、黔、桂三省的一致。龙济光经梁启超亲赴广州的劝谈，再加上龙济光的“鸿门宴”上梁启超义正严词的驳斥和各路军民反龙呼声的压力，龙最后被迫接受。

5月8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正式宣告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在梁启超拟就的宣言中，明确宣布，军务院依约法拥护黎元洪为总统，在总统失去自由不能执行职务期间，由军务院代行其对内外的职能，其实质就是南方四省的政府。

军务院成立后，督率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对袁世凯进行北伐。军务院的成立及其后对袁氏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给袁氏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军务院的成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护国运动的发展。

（五）护国战争的胜利

袁世凯过了83天皇帝瘾后，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他还是千方百计以各种理由想保住大总统的位子。梁启超清楚地认识到，袁氏一日不除，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就一日不成，护国战争也就失去其目的。因此，他力主袁氏非下台不可。

梁启超要逼袁世凯下台，首先利用自己的特长，从舆论上着手。梁启超针对袁氏党徒伪造民意拥戴袁氏做皇帝的电文，写了一篇《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对袁氏政府弄虚

作假，强奸民意的真面目，做了淋漓尽致的嘲讽、揭露和批判。不久，梁启超又发表一篇《袁世凯之解剖》，对袁世凯民国前后五年来言行进行总清算，对袁的本质进行大曝光。其揭露和批判，淋漓酣畅，入木三分。

同时，梁启超还着力从北洋集团内部下功夫。其重点自然是段祺瑞和冯国璋。早在云南起义之初，梁就暗中动员冯起义。帝制取消后，梁极力恭维吹捧冯，让其出面调解南北议和。冯国璋手握重兵，雄踞东南，早欲取袁而代之。梁启超想借助冯的力量逼袁退位，而冯也要挟护国军的力量增添倒袁本钱，双方在逼袁退位的问题上暂时联合起来。

北洋集团中另一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段祺瑞，他和冯国璋一样，早有揽北洋大权于一身的野心。帝制取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国务卿，而袁对他并不信任，相反却被处处掣肘，更加深了段的不满。梁启超多方运动，鼓励段祺瑞立即起来反袁。经过一段时间的思量，段祺瑞终于同意迫袁退位。

其后，梁启超再次致电各省都督司令，重申非袁退位不能罢兵谈和，并奔上海与冯商谈迫袁退位问题。正在梁启超为迫袁退位而四处活动之时，6月6日，在反袁护国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早已羞愤成疾的袁世凯，终于气绝身亡。护国战争事实上停止了。

此时的国内政局异常复杂，各派系间的矛盾与纷争十分激烈。一方面，南北仍处于严重的武装对峙状态，南方要求北洋军撤回，恢复孙中山的民元约法，而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却坚持武力统一政策，主张恢复袁世凯的民三约法。另一方面，北洋派和南方护国军内部也心怀异志，不尽统一。北

洋派中段祺瑞成为最大的实力派之一，他利用身在京城，位居国务卿的有利地位，操纵北方局势，觊觎总统职位。而冯国璋位居东南，拥兵自重，他因和护国军联系较多，比较倾向于向南方做些妥协。副总统黎元洪也不愿放过做总统的好机会，对段的专横霸道心怀不满。护国阵营内部也矛盾重重，袁世凯死后，已经宣布独立的陕西、四川、广东就宣布取消独立，退出护国军阵营，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主张扫除余孽，免除后患。而西南地方实力派唐继尧却把注意力集中到捞取地盘、扩充实力上。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梁启超主张迅速全面结束战争，统一南北，稳定全局。袁氏死后的第三天，梁启超立即致电段、冯这两个北洋实力派人物和独立各省都督司令，督促他们速奉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奉黎为总统，梁启超是出于黎既不是北军的领袖，也不是南方的象征，有利于南北统一的考虑。几天后，梁启超拟妥了南方五省的和谈条件，立即电告独立各省，予以实行。

对结束战争统一南北，梁启超把希望寄托在当时国内最大的统治阶级当权派，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身上。他认为段祺瑞是北洋的旗帜，求统一，自然要统一于北洋，统一于段祺瑞，并极力劝说南方拥护段的统一，同时梁还致电黎元洪，要求他让段出面组阁。为了屈从于北洋政府，促成早日统一，梁启超在惩办帝制祸首问题上由强硬到让步，还同意并实施了裁撤军务院。

至此，历时半年之久的护国战争以南北统一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宣告结束。

护国战争是继二次革命后又一次具有民主革命意义的战争，它推翻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梁启超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和主要决策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南北奔走，运筹帷幄，对战争的顺利进行直到最后赢得胜利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品质使梁启超将胜利果实又拱手送给了另一个专制独裁者段祺瑞，战争的结局和梁在诱迫护国军对段祺瑞妥协、取消军务院等表现令人痛惜。

护国战争结束后，梁启超作为促成南北统一的大功臣，自然受到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极度礼遇。黎一再邀梁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然而，梁启超此刻却不想再卷入政治漩涡，他决意弃政从教，拒绝了黎元洪的邀请。在对记者的答问时，梁提出要当“在野政治家”，第二次发出了他脱离政治的宣言。

九、“在野政治家”生涯

（一）研究系的形成及活动

护国战争结束后，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论，宣布要当“在野政治家”的梁启超又一次放弃了自己的誓言，决定再次和统治阶级当权派携手合作。此刻，军务院已取消，国会召开在即，为了控制国会使之成为宣传和实现自己主张的有利舞台，他决定把各地进步党人组织起来，壮大进步党的势力。在梁启超的号召下，进步党人成立了“宪法案研究会”和“宪法研究会”两个组织。两会名称虽有别，宗旨却无异。

在进步党人组党的同时，国民党人也相继组织起“丙辰俱乐部”、“客庐系”和“韬园系”三个政团。并于1916年9月9日将三政团合组为“宪法商榷会”。它集合了参、众两院的国民党议员380余人，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鉴于国民党各派系的合流，进步党人也于12日宣布将自己的两个政团合并为“宪法研究会”。集合参、众两院进步党议员160多人，成为国会中第二大党。这就是所谓的“研究系”。

不久，以段祺瑞为总理，包括段系成员、商榷系、研究

系议员在内的新内阁组成。在国会中，研究系和商榷系皆以国会为舞台展开了斗争。在国会外，北洋地方军阀张勋于6月成立徐州的“督军团”，肆无忌惮地干涉国会、宪法和内阁，形成一股军人干政的恶势力。在国会与督军团、商榷系与研究系、总统和总理的府院之间，都交织着异常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由此演出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斗争，使政潮此起彼伏，北洋政府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始终站在打击商榷系、支持段祺瑞的立场上。梁启超还和张勋拉扯关系，旨在借督军团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声势。

研究系和商榷系的争斗，更激烈地表现在制宪问题上。梁启超坚持认为中国国情不适于两院制，而只能实行一院制，同时他也反对省制入宪。对于省长要不要民选的问题，梁启超更是持否定态度。梁启超在制宪问题上的这些主张实际为“研究系”日后在国会中就宪法问题和“商榷系”展开争论定下了调子。1916年9月下旬，宪法审议会议开始审议宪法草案，研究系与商榷系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论争，甚至不惜大打出手。

双方在国会体制上的争论同样十分激烈。1917年初，梁启超还亲自离沪北上，为国会中的研究系同仁撑腰打气。然而，在修改宪法的这场斗争中，研究系及北洋军阀到底没有取胜，他们的主张最终没有如愿。

国会中两派的斗争，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德参战案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日为了争夺在华的利益，对中国是否对德宣战持相反的态度，并争相对中国政府施以

利诱。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扩充军队的财源，增强自己左右中国政局的资本，对日本的要求表示响应。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其对德绝交案。当时的国内舆论，主张居中立者多，一时朝野上下形成了强烈反对参战的舆论。

在国内舆论主流反对中国参战的时候，梁启超则完全站在支持段祺瑞、力主对德宣战的立场上。本来，梁启超是德国必胜论者，这时一变而为积极的对德参战派，促其转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德国失败的迹象逐步显露出来。梁启超很想借此机会在外交上搞一次政治投机，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变中国几十年来的外交窘境。第二个原因是重视对日本的关系，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对段派势力的支持在于希望通过外交问题压倒反对派商榷系。

梁启超就对德参战问题上给段祺瑞献计献策，同时还四处活动，并派人和张勋取得联系，以便获得北洋督军的支持。此后他不断地出入内阁、相府、国会，阐述主张。

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的立场理所当然遭到反对派的谴责和抨击。国会议员中多数反对对德绝交、参战。国民党人士、外交总长伍廷芳还致信梁启超，从中国的形势分析，力劝梁放弃参战主张。对反对派的意见，梁启超却不以为然。尽管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尽全力支持段政府，但由于总统黎元洪和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商榷系坚持对德方针只能做到绝交为止而反对参战，段政府参战意图难以实现。于是1917年4月，在段召开的北京督军团会议上，发出了一片对德宣战的叫嚣。5月，督军团策划组织各种“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强迫议员通过对德参战案。议员坚决不买帐，商榷系阁员相继辞职，

国会则通过对内阁不信任案。段祺瑞针锋相对，令督军团压迫黎元洪解散国会，黎严加拒绝，并罢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不甘示弱，立即通电煽动督军团反对黎元洪。5月29日，皖、奉等8省督军宣布独立。继而，研究系另一首脑人物汤化龙辞去众议院议长，研究系议员也纷纷辞职南下。北京政府陷入瘫痪状态。黎元洪孤立无援，一筹莫展，不得不向张勋发出进京调停的邀请。于是，张勋率4300余辫子军向北京进发，民国史上最丑恶的复辟一幕就要开场了。

（二）复辟丑剧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虽已宣布退位，但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封建小朝廷却依然存在。在它周围，聚集着一股复辟势力。既有前清的王公贵族和大批遗老，也有张勋、康有为这样的反动将弁和顽固文人。这些复辟分子成立组织、出版刊物，诋毁共和，鼓吹复古，为复辟前清大造舆论。不仅如此，他们还会趁民初的混乱多次策划武装复辟。其中，张勋在复辟势力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张勋（1854—1923），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兵痞出身，曾参与袁世凯的小站练兵，疯狂地镇压过山东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前官至清朝的提督和江防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南京与义军开战，失败后退至徐州，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民国以后，其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扎兖州，但他不忘前清，命令全军保留辫子。因此他的军队被称为“辫子军”。他在徐州、兖州一带，拼命招兵买

马，为复辟做准备。

1917年5月底，黎元洪邀请张进京“调停国事”，他认为复辟的绝好机会已经来到。于是，他当即率兵北上。6月8日至13日，他在天津用5天时间逼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14日便进入北京。

张勋进京后，经过半个月的准备、部署，6月30日夜就把溥仪从养心殿请出，身着前清朝服，叩头称臣，山呼万岁。第二天就通电各省，发布了一系列复辟的伪令，揭开了复辟的一幕。张勋因“拥戴有功”，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康有为被授为弼德院副院长。

张勋等复辟势力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推动下，南方各城市发起声讨复辟的强大舆论。

段祺瑞认为这是一个重新登台执政的绝妙良机，他决心打出反复辟的旗号。梁启超也紧随其后。张勋复辟的第二天，段祺瑞在马厂召开军事会议，组成“讨伐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梁启超任参赞，为段起草了讨伐复辟的通电。为了能更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反复辟的态度，梁启超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反复辟电》。表明了自己维护民国，反对复辟；维护资产阶级立宪政治，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立场。

马厂誓师后，讨伐军立即开始讨伐复辟的军事行动。辫子军不堪一击，节节败退。龟缩在北京城里的复辟集团动摇瓦解，纷纷外逃。康有为逃入美国公使馆，张勋抵抗无望，逃往荷兰公使馆。在四面楚歌声中，复辟丑剧上演仅12天，便以彻底失败告终。

不管怎么说，讨伐张勋取得了彻底胜利。梁启超在这场反复辟的斗争中，站在维护民国的立场上，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自然功不可没。在这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战斗中，康有为和梁启超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上，这种对立局面的形成绝非偶然。

从梁启超入康门为弟子到戊戌变法，梁启超被笼罩在康有为巨大的光环之下，基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受日本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思想发生转变，而康有为死守其老一套，拒绝新思想。两人在学术和政治思想上都可能出现分歧。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使康、梁在政治上分手。在护国战争爆发的年代，康、梁公开站在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水火不溶。梁启超是护国战争的主帅，对推翻帝制起了巨大的作用。康有为也赞成讨袁，但他的出发点是恢复自认为被袁世凯悖逆了的大清正统。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康有为公开了他的复辟主张。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对其师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坚持反对复辟封建专制的主张。张勋搞复辟闹剧，把康有为拉去做配角，康有为认为多年的复辟梦想可以实现，兴冲冲地北上与张合作。面对复辟的丑行，梁启超一面躬入段军参赞其反复辟，一面挥笔疾书，发表反复辟的电文，对康有为也毫不留情地批驳。短暂的复辟很快就结束了。北京政府明令通缉康有为等5名复辟分子。康有为不仅毫不自省，反而把失败的一肚子怨气发泄于梁启超。指责梁启超违背伦常，禽兽不如。从此，康对梁恨之入骨，几乎梁所主张和赞同的，他皆极力反对。昔日的亲密师生，至此已势不两立了。

（三）出任段阁财长

张勋复辟失败后，梁启超随段祺瑞一同回到北京。此时，冯国璋已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并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开始在北京组阁。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因一贯坚持拥段立场并襄赞反复辟而成为内阁的重要组成成员，而国民党人则因张勋复辟解散国会而被排挤在内阁之外。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在 9 名阁员中，研究系占得 6 席，达到了研究系的鼎盛时期。梁启超开始踌躇满志，准备在梦寐以求的财长位置上大干一番了。

上台伊始，梁启超让手头阔绰、擅长交际，既熟识外国银行，又能奔走于冯国璋、段祺瑞及地方军阀之间的王克敏担任次长，借以打通各路关节。梁启超紧接着就提出了“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八字方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算作了协约国成员之一。战争结束后，协约国一致决定，将中国每年偿付的庚子赔款，暂缓 5 年。这对梁启超接手的债台高筑的财政部，无疑是个好机遇，这意味着每年减少 1300 多万元的支出，梁启超决定把这笔钱用于币制改革，同时通过时任日本外相，梁的好友犬养毅，梁启超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第一笔 1000 万日元的“善后大借款”。不久，又向日本借款 450 多万元。同时他还采纳熊希龄的建议，在国内发行公债 5000 万元，加上日本借款，彻底地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把北洋政府的财政引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为此，他命令财政部公债公司拟定缓付赔

款办法，整理中、交两行的钞票发行和整理币制办法大纲。

然而，形势的发展令梁启超根本无法实现其财政计划。

此时的国内政局异常混乱。张勋复辟将国会解散后，段祺瑞重掌北京政权，他也并不想恢复碍手碍脚的国会。他玩弄花招，以成立“临时参议院”代替旧国会。段违反约法的行为引起国民党人士和南方各省的极力反对。张勋复辟前后，孙中山致电西南各省要人和国会议员，揭露抨击北洋军阀解散国会违背约法的恶行，号召两院议员全体南下，准备成立护法政府。南方的国民党领袖和各督军省长也发表宣言通电，主张恢复旧国会。7月19日，孙中山从上海抵达广州，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召开国会。在孙中山护法的号召下，原海军总长程璧光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7月21日在沪发表《海军护法宣言》，率舰队从吴淞口开往广东，极大鼓舞了西南各省护法的决心和热情。8月下旬，南下国会议员150余人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护法战争开始了。

段祺瑞自持北洋军武力雄厚，决定对西南发动战争。为了增强实力，段祺瑞拼命扩编军队。在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面前，梁启超“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使得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到期万不能缓”的内外债2400余万元丝毫无着落。梁启超无奈只好把海关余额和两笔日本借款搭上，并寄希望于再募集一些国内公债，以解燃眉之急。却不料此时段祺瑞又送来185万元的讨伐张勋军费要帐单。有了段祺瑞这个先例，一时间各种军阀的军费开支帐单如雪片般飞向财政部，梁启超一气之下，向

代总统冯国璋提出辞呈。

在梁启超看来，财政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也罢，但连财政现状都难以维持，自己这个财长干得还有什么意思呢？更令他难堪的是各省军阀自恃武力在手，军政二任，根本不把财政部放在眼里。他先后派往各地的财政长官因地方军阀的抑制始终不能就任，事情自然也办不成了。

辞呈递上去之后，冯国璋执意挽留，梁启超只得继续维持。此时，冯、段之争日烈，冯国璋为了倒段，提出“和平统一”的政策，段派往湖南、四川的北洋军被护法军打得大败，直系都督们又通电主和。段祺瑞政府四面受敌，段于11月15日向代总统冯国璋提出辞职。段祺瑞第二次内阁宣告倒台，财长梁启超在任上不足4个月后也悄悄离开了北京。

在护国战争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梁启超还是热衷于政治，寄希望于和统治阶级当权派的合作中推行他的宪政理想。然而，一年多的政治实践证明，这种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梁启超的政治迷梦也彻底醒了，他决心脱离政坛，告别仕途，从此专心致力于思想文化教育事业。

十、逆革命之潮流

（一）欧洲之行

梁启超经历了与袁、段两次合作的失败后，他对当时的政治终于失望了。辞去段阁的财长职后，开始了他最后 10 年的文化教育生涯。

1918 年 3 月，梁启超着手中国通史的创作，同时还为儿女们讲述国学源流。由于著述用功过度，染上肋膜炎，不得不中止写作。

1918 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与其研究系同仁开始漫游欧洲的准备。对于这次出游的目的，梁启超说：“第一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另外战争结束后，总要开一个所谓的“和平会议”，以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为了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各国都组织空前强大的外交阵容，准备在会上大干一场。而作为协约国的中国，却只派出一个由 5 人组成的代表团，人数少，力量弱。出于梁启超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国内舆论希望他能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外交出力。

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梁启超对于国内所请求，当然觉得责无旁贷。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梁启超筹借了 10 万元经费（北京政府所出 6 万，旧朋馈赠 4 万），精选了一批学有所长的名人（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百劭，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多对梁执弟子礼）作随员，准备动身。之前，梁启超从天津来到北京，拜见了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与驻京各国公使进行了必要的斡旋。

1918 年 12 月 28 日晨，梁启超携蒋百里、张君勱、刘崇杰、杨鼎甫等 4 人（因为船位紧张，丁文江、徐新六乘另一艘船经太平洋大西洋前往）在上海登上了日本邮船横滨丸号，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欧洲游历的航程。

梁启超一行的海上航行生活过得极为充实和快乐。他们先后经斯里兰卡、红海，过苏伊士运河，经过 45 天的航行达到欧洲的第一个目的地伦敦。在英国，他们列席了国会下院旁听，并四处游览观光。在伦敦停留一周后，梁启超一行动身前往巴黎。在那里巴黎和会正在举行，梁启超抵达后，立即以中国在野名人的身份活跃于和会内外。梁启超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在山东的权益。威尔逊等表面答应从旁协助。此次和会关系到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各种实际利益的重新分配。日本力图通过和会将霸占山东的现实合法化，派出了强大的外交阵营。而中国政府只有 5 人组成平庸的代表团，且北洋段祺瑞政府于 1918 年 9 月以牺牲山东权益为代价，与日本签订了 2000 万元的借款密约。根据密约日本继承并扩大了

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梁启超事先并不知道中日之间的这个密约，因此对中国外交尚存希望。抵巴黎后，梁得知此密约，愤怒之极，只得如实向国内报告。并受国内委托向巴黎和会请愿，力争山东主权。梁启超力图有所作为，无奈日本因密约有恃无恐，公议最终承认了日本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虑签字。面对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梁启超忍无可忍，立即致电国内，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这就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代表被迫拒签和约。

和会期间，梁启超作为中国名人，受到法国政府的热情礼遇，梁就不平等条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为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和会休会期间，梁启超一行对欧洲的西部战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战地考察后，梁启超撰写了一篇《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在法国，梁启超结识了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和外交家笛尔加莎。此二人极为佩服梁启超出色的才华，因此双方一见如故。此外，他们还参观了卢梭故居，游览了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观看了西方的戏剧。在有限的时间内，梁启超广泛地考察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收获极大。

6月初，梁启超一行离开巴黎，并往英国游历。在英国，他们出席了英国皇家、伦敦市长、各大银行、商会、文学会为其举行的宴会、茶会，参观了著名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访问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文豪苏噶特、莎士比亚的故居，游览了爱丁堡的名胜，考察了伯明翰等城市的

工厂，参观了英国的海军军舰。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广泛地接触了英国的社会与文明。

7月中旬，梁启超一行离开伦敦，返回巴黎，参加了法国的国庆和凯旋典礼，之后，开始游历比利时、意大利，然后返回巴黎。居留两个月后，出发考察德国。

在为期一年的欧洲游历中，梁启超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文明。1920年1月，梁启超一行由德国返回巴黎，匆匆打点了行装，于1月18日赴马赛，在那里登上了法国的邮轮，启程回国。

（二）撰写《欧洲心影录》

欧洲归来后，梁启超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欧洲心影录》。这部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考察结果，反映了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和看法，也反映了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总观点。

一年多的游历，使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混乱社会状况，对西方文明所遭受的灾难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他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于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变化和自由竞争，他反对把科学、物质生活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

在《欧洲心影录》里，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思想上的转变。他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由传统，对西方文化中的核心“自由精神”表示认同和推崇。在著作中他还说到，思想解放可能会带来道德条件的动摇和社会罪恶的出现，但是，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锁起来，也会有不奉行道德的行为。因此他

对压制批评，扼杀自由的文化专制是深恶痛绝的。

梁启超反对西方文化把物质生活、科学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但他并不反对科学，更不是要放弃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梁主张向西方推广重精神生活的东方文明。

梁启超仍然倡导个体本位的资产阶级文化伦理观。他强调中国要富强必须培养新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即个性解放。他也强调人的自尊和独立人格。同时他还指出个人自由不能侵犯他人自由，个人、群体要相结合。

在《欧洲心影录》里，他对欧洲文明的前途总的来说还是乐观的。他认为欧洲文明绝不会破产、灭绝，因为欧洲的文明已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还提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观点，他批评思想文化上的顽固保守，讥讽全盘欧美化论调，他主张用西方文化作为整合手段，达到复兴或改造中国文化的目的。

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在感情上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欧洲心影录》中他希望用西学革新，在改造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之，使之成为一种新文化，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头脑，在发展中国文化思想上是有积极贡献的。

（三）坚持改良主义立场

梁启超退出政坛从事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后，他通过社会改革最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并没有放弃。1920年3月，欧洲归来后不久，他便把研究系同仁创办的《改造》杂

志接了过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改造思想。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对中国历史发生深远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占了主导地位。陈独秀、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近代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前后，就对社会主义有一些零星的了解，在欧洲游历时，他也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悉心的考察，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是他并不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理由是中国没有近代工业，当然也没有劳资两大阶级的矛盾，因此中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蓬勃发展。恰在这时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宣扬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当然也无须进行阶级斗争，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梁启超紧跟罗素的言论，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

梁启超认为不能兴起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劳动阶级。认为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然后再对其进行改良。从这些立场出发，梁启超坚持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人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政党。

梁启超同时还提出了国民运动论，即多数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他认为国民运动是唤起国民参政意识的好办法，是使中国政治走上民主轨道的唯一途径。当然这种和平改良的梦想，对于几百万军阀政治的社会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就连梁启超自己也很快意识到这种运动的不可能性。

（四）支持联省自治和幻想组织第三党

护法战争后，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公开化且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直系联合奉系及西南军阀，打败了皖系军队主力，攫取了北京政权。直系从英美列强那里借来了大笔款项，购置了大批军火，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军阀叫嚷“联省自治”，其目的自然是在于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而绝不是为了建设一个联邦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以湖南军阀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开始，一时各省纷纷仿效，联省自治似乎成了解决时局问题的良方。

梁启超站在资产阶级分权主义立场上极力支持联省自治。梁启超合作于袁世凯、段祺瑞政府时都希望先集权，后分权，在与统治阶级当权派合作的基础上，慢慢引导中国走上资产阶级的宪政轨道。所以梁一直坚持分权主义。湖南宣布自治后，梁启超兴奋不已，欣然接受了参加湖南的制宪工作。为湖南制定了《省宪法大纲草案》。此时吴佩孚为实现“武力统一”的美梦正率直系军队与湘军开战。梁启超亲笔致函吴佩孚，希望他以联省自治谋求国家的统一。吴佩孚对梁敷衍一番，并无诚意，其他一些省也是空嚷嚷，并无什么行动。自治也并没有带来和平和安定。在帝国主义列强分割操纵中国，军阀武人割据称雄的社会前提下，建立联邦制度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梁启超等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

实现了国共双方的第一次合作。此后几年，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取得节节胜利。对如此高涨的革命形势，梁启超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反对的矛头对准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也对准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作为主张温和和改良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一向渴望在稳定平和的社会秩序下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而畏惧和敌视群众运动。这种立场对他来讲是一贯的。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上，他宁可与军阀势力为伍，反对国、共两党。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与研究系的同仁们便站在军阀一方。军阀孙传芳失败后，他曾把反共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蒋介石身上。后来，随着蒋的血腥统治日益公开化，梁启超对蒋介石的幻想也渐渐破灭了。

为了阻挠国民革命的浪潮，对抗蓬勃发展的工农群众运动，梁启超决定亲自上阵，组织自己的联盟，树起自己的旗帜。1927年初，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及部分工商界成员，想与研究系联合，拥戴梁启超作领袖，组织一个反共大同盟。梁启超审度时局，虽然感到“时机未到”，不能答应此要求，但他认为不能听任这些反共的非国民党团体“散漫无纪”。他决定开展一个“党前运动”，拟设一个“虚总部”，为反共的上述团体居间联络，为最终成立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党作准备。但此举终于没有形成气候。

十一、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

（一）办学与讲学

欧洲归来后，梁启超开始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梁启超反思自己的政治生涯，认为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缺乏人才。于是他决定弃政从教。

梁启超晚年从事的学校教育活动中，最令他关注的便是上海的中国公学。该校的正副会长和常务董事多为旧日的立宪派和进步党人，与梁启超关系较密，故梁欧游归来，一到上海便被公学请出演讲。为了办好这所学校，梁启超让其学生张荪出任教务长，并为公学制定了改制方针。为了筹措办学经费，梁启超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多方活动。中国公学在梁启超手上一共维持到1927年，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在承办中国公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把关注教育的目光投向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南开他受到校长张伯苓的极力推崇，决定把整个文科交梁主持。梁启超还担任了清华研究院导师。

在南开、清华等院校长期讲课的同时，梁启超在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说，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题材之博，影响之

大，听众之多，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演讲史上都是空前的。

在几年时间里，他辛勤奔波于各地讲学。梁启超的讲学是极其认真的。他的每篇讲稿都会认真准备，绝不马虎。凡已定好的演讲，即使遇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亦绝不停讲和改变日期。梁启超的学术讲演认真而又极为生动，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生。

（二）推进文化交流

梁启超是个文化融合论者，推进中外文化交流是他晚年极为热衷的一件事情。欧洲游历归来后，他组织了两个学术团体——共学社与讲学社。这两个组织对推进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共学社的主要工作，一是出版杂志，二是倡导图书馆事业，三是选派留学生，四是编译新书出版。其中，编译新书成为共学社的最大成就。共学社在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同时，还出了许多其他方面的书籍，影响很大。

讲学社的宗旨是聘请“外国名哲”来华讲学，每年一人。讲学社聘请的第一位“国外名哲”为美国著名哲学家、实用主义者杜威。梁启超对其人评价甚高。

讲学社聘请的第二位“国外名哲”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社会历史评论家罗素。在哲学上罗素坚持中立一元论。梁启超之所以盛邀罗素来华，一方面是因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地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政治主张。罗

素是积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点正和梁启超不谋而合。罗素的到来，使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罗素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学社聘请的第三位“名哲”是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杜里舒属于生命派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其来华后，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学术演讲，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讲学社聘请的第四位“名哲”是印度文学家、著名诗人泰戈尔。梁启超对泰戈尔的来华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泰戈尔在京发表了数篇演说，轰动一时。梁启超对泰戈尔痛斥西方思想沉沦于物质主义、排他主义、征服主义的观点推崇备至。

由于当时北京政府未能继续拨款，讲学社财源趋窘，邀请国外名哲来华讲学之举在泰戈尔离华后不得不告停顿。尽管讲学社先后仅邀请四位“名哲”来华，历时不长，人数有限，但由于他们都是名噪一时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对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为深远。

（三）著述成果

梁启超一生留下上千万字的著述成就，其中尤其是他告别官场之后的短短十年成绩卓著。他以“百科全书”般的气派，写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介绍外国政治、经济、财政、历史、哲学、文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等方面的文章，同时也撰述了一批涉及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法学、文学的论著。这些著述时间上贯穿古今，地域上包含中外，使他成为构架新文化的新星。

1920 年，梁启超以一周的时间创作了后来久负盛名的《清代学术概论》，成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开拓性著作。

梁启超倾力较多的还有对先秦诸子和佛学的研究，撰写了一系列的著作。梁启超在南开大学的讲义，被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宝典。

梁启超一生的著述可以说是卷帙浩繁。这是与他卓越的秉赋、出众的才华与勤奋分不开的。1928 年，他在病中还坚持作《辛稼轩年谱》，梁启超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令后人仰目。

十二、逝世

1924 年，梁夫人李惠仙病逝，对梁启超打击很大，爱妻的长别，令梁情绪尤为不佳。1926 年 1 月，医生查出梁便血，后经医治有所好转。1927 年 3 月，康有为逝世，梁启超回想几十年的师生情谊，伤心极至，便血病又犯。对梁启超刺激更大的是 1927 年 6 月王国维的自杀，哀悼和悲慨之情更加剧了梁的旧病。但他仍不懈地讲学、著述。1928 年，梁的病情加重。

1929 年 1 月 19 日，梁启超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与世长辞，享年仅 56 岁。中国近代的一颗新星殒落了。

梁启超的逝世惊动了世界各界，唁电、唁函、挽联、挽诗一时间如雪片飞来。2 月 17 日，北京各界 500 多人 为梁举行公祭。社会各界名人如熊希龄、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任鸿隽、陈衡哲、袁同礼都到会痛悼先哲。

同一天上午，上海各界也举行了追悼大会。社会名流蔡元培、唐麟、叶誉虎、刘文岛、高梦旦等到会者百余人，学界、政界、商界等来者甚众。蔡元培、杨杏佛、沈商耆、杨度、王文濡都写了深情的挽联。

美国一些学者对梁的去世也深表怀念。

梁启超的一生，影响和教育过整整一个时代。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胡适、陈独秀、曹聚仁等中国近现代史的优秀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受过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留下的那些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永远值得后人珍视。梁启超的影响也必将永存。